



《重庆地方志》编委会

主 任：何晓栋

副 主 任：徐 斌

委 员：曾 伟 司逸澈 郭永彬

董宁波 熊蜀黔 夏吉敏

陈 伟

《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徐 斌

执 行 主 编：熊蜀黔

执行副主编：陈 伟

编 辑：周怡彤 张 莉 陈欣如

校 对：黄仕洁 邱雨婷

主 办：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辑：《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四支路

4号信一金典4楼

邮 编：400020

联系电话：023-89075121

电子邮箱：cqdfz2017@163.com

印 刷：中雅（重庆）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渝）2025700

目 录

CONTENTS

志鉴研究

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回顾与总结……………王福忠（2）

论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的设置

——以重庆部分区县年鉴为例……………陈朝权（11）

历代万县现存旧志述略……………熊茂松（18）

文史纵横

南宋“重庆府”得名真相探析……………邓显皇（26）

荣昌区建置沿革考……………滕新才（36）

澳大利亚驻渝使馆见证的战时中国外交……………刘婧雨（48）

档案方志为钥

——解锁一名江津籍抗战川军的乱世生平……………匡 勇（53）

地情揽胜

家乡的几件“宝物”……………樊家勤（55）

渔村上长出的城市……………文 猛（60）

工作动态

重庆市方志馆高校分馆（川渝共建）授牌仪式在重庆举行……………（封二）

何晓栋调研黔江、酉阳地方志工作……………（封三）

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回顾与总结

王福忠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项“为民族文化续脉”的基础性文化工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首轮编修的《璧山县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璧山县编修的第一部县志；第二轮编修的《璧山县志（1986—2005）》，是璧山县编修的第三部县志，《璧山县志（2006—2014）》，是第三部县志。《璧山县志》编修始于1981年，至1996年出版，历时15年；《璧山县志（1986—2005）》于2002年启动编修，到2011年12月正式出版，历时9年；《璧山县志（2006—2014）》于2014年启动，到2018年出版，历时4年。三部县志记录1911年至2014年这105年间璧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文、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将璧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具鲜明特点的历史阶段浓墨重彩地展现出来，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璧山历史画卷。

党的二十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站在历史新的起点，要紧紧把握新时代的特征，研究修志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推动修志事业持续快速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为此，本文回顾了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总结提出了一些思考，以期对第三轮修志抛砖引玉。

一、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回顾

（一）首轮《璧山县志》编修回顾

首轮璧山县志编修工作始于1981年，前后7次易稿，历时15年，于1996年3月出版。从编修过程来看，历经成立机构、纲目编制、组织发动、资料征集、分篇编纂、纠错打磨、审定出版阶段。

1. 成立机构阶段（1981年4月）

1981年，根据四川省和重庆市要求，为完成首轮县志编修工作，璧山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成立县志编修委员会的通知》（璧府发〔1981〕135号），成

立璧山县县志编修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由县长、副县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县长任编委会主任，副县长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协。1982年，中共璧山县委印发《关于成立党史征集小组和重组璧山县志编修委员会的通知》（璧委发〔1982〕27号），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直机关党委）和重组璧山县县志编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仍在县政协），加强县志编修工作。1985年正式成立璧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与县志编修办公室合并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随后至1989年53个部门纷纷成立部门志编修机构，为县志编修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纲目编制阶段（1981—1995年）

1981—1985年，县志编修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实行“一稿抢”办法，先明确县志上限时间为1911年，下限时间为1985年，采用大篇体结构，多次讨论后拟定纲目6大篇42章82节。1990年，对《璧山县志》纲目（第四稿）作重大调整，原6大篇改为中篇平列模式，拟定纲目24篇95章82节，节下设子目。又因改写难度较大，基础资料薄弱，于1995年4月前再次对纲目进行调整，形成21篇90章315节，获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通过。

3. 组织发动阶段（1981—1990年）

1981年组建县志机构后，因各种原因，县志编修工作基本未开展起来。1986年，县委常委会针对这种情况，专门召开专题会议，将县志编修工作纳入

考核，同时调整充实编修委员会成员及其办公室，加强编修力量。同时，根据《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1986—1990）》（川办发〔1986〕11号）和重庆市志实施方案的要求，县志编修委员会以《关于新编璧山县志的各专志分工的请示》（县志编委发〔1986〕2号），明确35个单位修志。5月20日，县委、县政府批转县志编修委员会《关于新编璧山县志的各专志分工的请示的通知》（璧委函〔1986〕48号），明确51个部门（后调整为53个单位）编修部门志和县志编辑班子，建立了县长为县志编委主修（主任）制，使县志工作走上正轨，部门志工作也相应展开。1988年2月召开全县第二次修志工作会，副县长、县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再次作了强调。随后，县委印发文件，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将修志工作纳入重要工作。为此，县志办举办短期培训班5期，编发《璧山县志资料》30余期，召开志书采编人员研讨会多次等。同时，建立县志编修督察通报机制和定期汇报工作制度，为县志编修工作完成提供了组织保证。

4. 资料征集阶段（1981—1989年）

1986年5月5日，县政府发出《新编〈璧山县志〉征集史料的通告》。当时县志办仅有民国6年续修的《璧山县志》（残本）及1959年续修的《璧山县志》（草稿），远不能满足这次修志的需要，于是启动史料征集工作。一路人员到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北碚档案馆、图书

馆等处收集了大量县情资料；另一路人员到故宫博物馆复印清乾隆《璧山县志》，从石家庄图书馆复印清嘉庆十七年《璧山县志》；第三路人员到国际友人柯鲁先生处接受赠送清同治四年《璧山县志》复印件（10件）。三路人员先后查阅档案3万余卷，书籍（刊）500余册，摘抄资料5000余万字，复印资料20余万字，发出调查信函250多件，走访100余人次，获得不少宝贵资料，为县志的编修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支撑。

5. 集中编纂、纠错打磨、审定出版阶段（1981—1995年）

1981年县志机构成立后，编修县志原采用“宝塔式”，即先修乡志，后修部门志，再修县志，但因时间、人力、财力等原因，调整为抓县志、部门志同步进行。1986年，根据县志编修实际情况，先后抽调聘请10余人共同编修，形成10人的专门编辑队伍。1986年12月，完成《璧山县志》的《建置沿革》和《自然地理》2篇初稿。1989年6大篇大部分章节均成初稿。1990年，形成县志初稿85万字，进行征求意见。1991年，完成对初稿的修改，形成96.7万字。在此调整期间采取按新立纲目，从主编、副主编到责任编辑，对初稿进行改写；未完成的篇章一步到位形成初稿。初稿由主编、副主编通阅通改后送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其间，反馈不少中肯意见。从1991年至1992年10月，县志顾问、评审对县志初稿进行初审，各篇几易其稿方定为送审稿，县志主编、副主编将

其相关篇章通纂，消除“硬伤”，增删错漏。1993年10月25日，送审稿送重庆市志总编室审查。1994年2月，市志总编室与县志办交换意见，提出近1000条意见。县志办按必改、建议、参改等三种类型意见，逐篇、逐章、逐节、逐句核对资料、调整字句。其间，对意见之外新发现的资料错漏、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本着精益求精、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作了增删或调整。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县志办再次组织相关专家对《璧山县志》进行复审打磨，将《璧山县志》调整为21篇，在资料、结构、文字等方面又进一步完善。1995年10月9日，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以重志办〔1995〕46号复函，同意《璧山县志》正式出版。

（二）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编修回顾

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的修编工作始于2002年，历经了9个春秋，从修编进程来看，大致可分为启动、分篇编纂、总纂、纠错打磨和审定出版四个阶段。

1. 启动阶段（2002年6月—2004年底）

这一阶段主要是建立健全机构和修志队伍，培训业务，制定编修工作规范，拟定篇目，指导、督促和审定验收部门志的编修。

2002年6月，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第一届市志编纂进度切实做好续志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02〕52号）要求，璧山出台《关于

切实做好全县地方志续（新）修工作的通知》（璧山府办〔2002〕93号），明确续修《璧山县志》1部，续修部门志13部，新修部门志39部，乡镇志9部，新修学校、风景区、村志7部以及67个单位提供县志资料长篇。部门志编修工作涉及全县53个单位，1000余人参加，到2007年底，相继编纂38部部门志（乡镇、学校志），还有15部正在编修中。200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届区县（自治县、市）志编修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03〕158号），按照全县修志工作的总体部署，县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志办）组织相关人员，于2004年10月到长寿、涪陵等地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县实际，草拟了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工作部署，报请县委、县政府和县志编修委员会审定。2004年12月，中共璧山县委办公室、璧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第二届〈璧山县志〉编修工作的通知》（璧山委办发〔2004〕194号），标志着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编修工作正式启动。初步拟定了县志纲目，设9篇67章，预计约130万字。并聘请原璧山县志的老主编2人，开始新一轮县志大事记的收集编纂工作。

2. 分篇编纂阶段（2005—2007年）

这一阶段主要是根据县志编纂任务要求，指导、收集、采写资料长篇，选聘编修人员，完成初稿。

县志办按照《关于认真做好第二届

〈璧山县志〉编修工作的通知》（璧山委办发〔2004〕194号）要求，采取两步成志，分步实施的方式来编修县志。首先，成立县志编写指导组，开展业务培训，现场指导县志资料的收集、编写。2005年初，组织召开了全县县志资料编写人员培训会，培训主笔121人。同时，县志办还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选派业务骨干参加市志办组织的修志理论培训，为本轮县志的编修奠定了人才基础。其次，县志办草拟续修《璧山县志》征集资料的报告，报请县政府批准。2005年3月，县政府以通告的形式，向全县人民和社会各界发出《关于续修〈璧山县志〉征集资料的通告》（璧山府发〔2005〕17号），广泛征集有关史实资料、实物、照片等。在深入各个部门指导县志资料长篇编写的同时，广泛征求各部门的意见，7易其稿，于2005年底形成县志纲目的第二稿。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县政府下发《关于认真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通知》（璧山府发〔2006〕87号），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在认真学习贯彻条例的过程中，切实抓好第二轮璧山县志的编修工作。到2007年9月，全县有近110个单位完成了资料长篇，一些单位如财政局、纪委、农综办、建委等部门还提供了更为全面、更加翔实的资料。鉴于此，县志办于11月组织业务骨干到大足县志办学习考察后，进一步提出第二轮《璧山县志》应该突出时代特色、地方特色、结构特色，组织力量再次对

县志纲目进行研究、修订，将原来的9篇67章调整为12篇71章，新设改革开放、专记、鞋业、机械加工、建筑建材等篇章，并对其他篇章作了适度调整。到年底，全面完成县志的资料长篇工作，撰写大事记、环境、政治、综合管理等篇章的初稿约100万字。

3. 总纂阶段（2008年1月—2010年9月）

这一阶段主要是补充完善资料，采写人物资料，总纂县志初稿。

2008年初，县人民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完成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任务纳入了政府当年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之一。为此，县志办组织10多人的精干编修班子，进行专题研究，制定工作方案，落实责任，明确任务，开展县志初稿的总纂工作。4月至6月，由县志办一名副主任带队，开展县志资料的补收和攻坚工作，采写收集查证相关资料，先后补充收集了新设纲目中68个章节的内容材料，约60万字。7月，县志办邀请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领导和专家，到璧山县指导第二轮《璧山县志》的编修工作，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县志办经过认真讨论，充分吸收意见，又对纲目作了微调，将原来的街道镇乡篇归到第一篇环境中，将原经济（上、中、下）三篇调整为经济综合管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四篇。

县志人物篇的编写是一部志书的亮点，县志办发文并在《今日璧山》等媒

体上，向社会征集人物篇中入志人物的线索和资料等，2007年6月，县府办印发《关于编纂〈璧山县志〉（1986—2005）人物篇的通知》（璧山府办发〔2007〕74号），明确了入志人物立传、简介、名录、名表的具体收录标准和要求。2008年初，县志办为此安排专人负责人物篇的组稿工作，并聘请3名编辑人员具体采写。9月至10月，县志办组织相关人员，分成3个采编组，到重庆、南京、上海，石家庄、北京等多地，现场征集50余名璧山籍个人资料26份，书籍20册，图片500余张，还将清乾隆《璧山县志》和同治《璧山县志》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复制回来。

县志办始终坚持开门修志，博采众长，集思广益。11月4日，邀请县内10余名老同志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对县志附录中的有关事项进行研讨，开始对县名和建县以前的归属进行考辩和考证。到11月初，终于将200多万字的初稿打磨成130多万字的评审稿。

2008年12月初，县府办邀请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及6区7县的方志界的领导和专家到璧山，评审《璧山县志》初稿。到2009年2月底，《璧山县志》初审稿打磨基本结束。2010年初，通过了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复审。

4. 纠错打磨和审定出版阶段（2010年10月—2011年12月）

按照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验收意见，为确保质量，璧山在县志出版前

再进行了一次纠错打磨工作。主要是校核志稿记述是否存在明显失实,例如时间、地名、人名、事件、数量等方面的明显错误;志稿记述是否存在重要遗漏,例如具有鲜明地域、部门、行业特色和强烈时代特点的重要史实的遗漏;志稿记述是否存在明显的累赘重复、层次混乱。到2011年6月底形成了县志定稿,并分送有关领导最后审定。2011年7月至12月,经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两位责任编辑,长达半年时间的三审三校,终于付印出版。

(三) 第二轮《璧山县志(2006—2014)》编修回顾

2014年7月璧山撤县设区后,为了把璧山县的历史完整地呈现给世人,区地方志办公室于2014年10月开始谋划续修第三部新编县志《璧山县志(2006—2014)》。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志办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区级各部门和各镇街的大力配合下,《璧山县志(2006—2014)》经过全体地方志工作者努力,历经4年,于2018年12月出版。

回顾《璧山县志(2006—2014)》的整个编纂历程,主要经历工作准备、资料收集整理、志稿分纂、志稿总纂、志稿评审5个阶段。

1. 工作准备阶段(2014年10月—2015年5月)

2015年1月,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区志编修委员会和《璧山县志(2006

—2014)》编辑部,确定了《璧山县志(2006—2014)》主编、执行主编、责任编辑等相关责任人员。2015年5月,区政府召开县志编修工作会,区政府分管副区长在会上对县志编修作了安排部署,并代表区政府与各承修部门、镇(街)签订了县志编修责任状。区地方志办公室经过广泛调研考察学习和总结上一部县志编修经验的基础上,理清编修思路,制订总体编修方案;制定并反复修订的《璧山县志(2006—2014)》纲目通过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审批;培训修志人员230余名,聘请10名专家、学者参与县志资料长篇编写、初稿分纂、篇目总纂等工作。

2. 资料收集整理阶段(2015年6月—2015年12月)

县志各承修部门采取边收集、边考证、边整理、边消化的方法,广泛开展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形成资料卡片及文摘后,提交给了区地方志办公室。区地方志办公室及时对各承修部门所提交的资料进行了编辑加工,在形成资料长编后,再返回给承修部门补充完善,经各承修部门审查盖章后,最终形成县志资料长编30篇。

3. 志稿分纂阶段(2016年1月—2016年11月)

编辑部遵照区政府分管领导“加快进度保质量”的工作要求,定专人、定任务、定时间,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启动志书初

稿撰写。至2016年11月,30篇初稿分纂全部完成,计250万字。

4. 志稿总纂阶段(2016年12月—2017年11月)

主编、执行主编、责任编辑和聘请的专家各司其责,对志稿存在的入志标准不一、篇目结构不合理、资料运用不适当、文体文风不统一等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至2017年8月,形成总纂稿210万字。随后,按“史实翔实、体例完备、特色突出、语言规范、文风端正、结构严谨”的要求,对总纂稿再次进行统稿和推敲打磨。2017年11月,形成送审稿。

5. 评审出版阶段(2017年12月—2018年12月)

2017年12月21—22日,区志编修委员会召开《璧山县志(2006—2014)》评审会,会上收到修改意见、建议200余条。此后,编辑部按评审会上收到的意见和建议对志稿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改完善,形成终审志稿180万字。2018年8月,区地方志办把志稿提交给市地方志办复审验收。9月,志稿顺利通过市地方志办的审查验收,并经市政府批准出版。

二、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的经验教训

在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的编修过程中,就采用什么结构形式进行编纂,凡例的编写以及对纲目、凡例、主体内容一致性问题和专业人才问题也存在诸

多看法。回顾这段历史,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

(一) 关于大篇体式结构问题

首轮新编《璧山县志》,最先采用大篇体,设置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六篇。后因编纂中出现问题,才改为中篇体,设置25篇。又经市志办审查,调整为21篇92章才终审通过出版,前后经历10年时间。而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又改成大篇体结构,增加了续修难度。

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虽然突出了大篇体式的优点,但也凸显了缺点。如突出地方特色问题,璧山县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优势,工业强县、西部鞋都等特色难以凸显。志稿中归类不当有之,如“城乡建设”应属经济类的第二产业而另立大篇。再有篇幅的协调问题,因经济类篇幅过大而将一、二、三产业各立大篇,造成不属于志体的科学分类法分类。

《璧山县志(2006—2014)》改为中篇体结构,但部分篇章节目的设置仍有不足,如有的篇上百页,有的篇不足10页,有的篇呈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同时,地域特色不够突出。

(二) 关于志书凡例的确定问题

志书的凡例,是编纂志书的基本法则,具有法规性和条文性特点,是编纂者遵循的基本原则,具有统一性。凡例的内容应当简明扼要,文字精练,要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在继承的基础

上创新。

首轮《璧山县志》凡例有9条，其中第6条对记述称谓、计量单位文字精练不够，过于繁杂。同时，记述称谓是新编地方志的基本要求，不宜在凡例上体现。

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的凡例、规定有8条，对该志的指导思想、篇目设置、志体、人物、称谓、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编纂规则等作了规定。但文字较长、篇幅较大，有1100余字。要做到文字简练、言简意赅、规定明确、表述确切。如指导思想、时限、地域、体例、称谓、人物、计量单位、数据应用等简明扼要明确规定即可。

《璧山县志（2006—2014）》凡例有15条，设置规定较多，特别是将地名、照片、索引排序等规定纳入凡例中值得探讨。

（三）关于志书纲目、凡例、主体内容一致的问题

三部璧山县志中不同程度存在部分主体内容与纲目、凡例记述不一致现象。如第二轮璧山县志中的统计资料、文史资料选录及后记的记述。

志书编纂出版规范有全国的和各省市的，包括文体、计量单位、数据、图表照片、标点符号等规定。2013年11月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公布了《重庆市第二轮市志、区县（自治县）志编纂出版规范》13个方面42条，规定了志书

名称与署名、记述时限与范围等各个方面。但志书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些规定统一编纂。

要达到统一规范的问题，就要解决好总纂（统稿）的问题。志书的编纂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工程，涉及范围广、参与人数多，即常说的“众手成志”，需要“一支笔”来统领完成。只有通过“一支笔”才能真正做到：体例一致，“消除杂乱”；文体统一，“消除差异”等。

（四）关于地方志专业人才凋零问题

璧山首轮、第二轮修志，都出现地方志专业人才奇缺问题。首轮修志基本上是抽调，第二轮修志也仅有地方志专业人才2名，后增至4名（含2名领导），方式上全靠聘用、借用、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来弥补，但仍感专业人才、专业知识的不足，造成编纂出版时间跨度较长，也影响了编纂质量的提高。

三、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的启示

回顾首轮、第二轮璧山县志编修历程，可以说自始至终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得到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精心指导，得到各级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些好经验和做法对第三轮修志仍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是编修志书的保证

璧山修志表明，没有党委和政府的

大力支持，修志工作难以凝聚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保证，特别是璧山县委、县政府将修志“政令”纳入各级各部门的议事日程，与承修单位领导签订修志目标责任书，成为县志编修的“助推器”。三部志书编修，县、区财政投入编纂经费是大幅度增长，首轮《璧山县志》编修县财政投入100余万元，第二轮《璧山县志（1986—2005）》《璧山县志（2006—2014）》编修县、区财政分别投入200余万元和400余万元。

（二）坚持“众手成志”是基础

璧山两轮修志过程中，克服自身人手不足的现实问题，主要是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各系统积极组建专班，紧密配合县志的编修。一是宣传保障。县志编纂启动之前，就在县电视台、《璧山报》《今日璧山》等媒体上宣传县志编修工作，大力营造全县（区）修志氛围，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为修志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二是合力编纂。编修县志启动后，各纂稿单位立即成立县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细工作推进计划，编修人员主动参加学习培训等，为县志编修工作按时完成提供基础保障。三是人力支持。县志在编修之初，县内不少部门领导、行业骨干、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文史类专家学者积极主动报名参与，据粗略统计，两轮修志超100人主动参与修志，为县志编修提供人力保障。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下，各单位也将编修工作纳入专项考核，推进县志编纂工作顺利高效开展，同时，积极调进或抽调相关工作人员参与修志，增强修志力量等，这些都是齐心协力“众手成志”的坚实基础。

（三）纲目的编制是核心

纲目的编制是一部县志的核心、骨架，既要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又要突出地域特色、时代特征，还要符合“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基本要求，科学分类与现实社会分工（现行管理体制）、全志整体性与分志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处理妥当，达到整体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类目的升格或降格使用适当。在纲目的编制中，以行政管理模式为依据设置结构和分类的惯性思维须引起重视。在首轮志书编纂过程中，以行政管理体制为主编制的纲目结构，导致地域特色突显不够。第二轮县志纲目编制过程中，虽吸取了首轮县志纲目中的经验得失，对纲目进行了革新，突出了一些地方特色，如设置“专记”等，同时引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类目等，但也存在特色不够明显，如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体现不够明显，与地方发展结合不够紧密等。

（作者单位：璧山区档案馆）

责任编辑：熊蜀黔

论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的设置

——以重庆部分区县年鉴为例

陈朝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①这是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②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地方综合年鉴如何记录各地推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工作，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地方综合年鉴设置乡村振兴类目的重大意义、乡村振兴内容编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乡村振兴类目框架设置的建议三个方面入手，结合近年各地年鉴编纂的实际情况，对地方综合年鉴如何设置乡村振兴类目谈几点想法。

一、地方综合年鉴设置乡村振兴类目的意义

2025年1月1日，中央出台一号文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第2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第25~26页。

件，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地方综合年鉴设置乡村振兴类目，既能体现综合年鉴响应国家战略、突出时代特色，又能记录乡村发展、传承乡村文化，展示综合年鉴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意义深远。

（一）体现综合年鉴的政治性

《地方志工作条例》^①第三条明确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不仅要记录新时代、服务好新时代，更要讴歌新时代，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的重要决策。农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年鉴设置乡村振兴类目，体现方志人讲政治、守规矩，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主动作为，切实担负起为党立言、为国存史的使命和担当，体现综合年鉴的政治性。

（二）记录乡村发展

综合年鉴通过设置乡村振兴类目，可以系统地记录乡村发展的历程、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取得的工作成就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和典型案例，为未来的乡村发展规划、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同时，通过综合年鉴的有效利用，可以宣传乡村发展的成功案例，激发社会各界对乡村发展的关注和支持，促进乡村发展。

（三）传承乡村文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综合年鉴通过记录乡村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增强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四）提升乡村形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编纂地方综合年鉴，要服务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记录好当地党委、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的伟大成就。^①年鉴编纂工作者应该站位更高，从更深层次、更宽视野去看待乡村振兴战略，记录好乡村振兴工作，成为党委、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决策参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乡村、了解乡村、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窗口。

二、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设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各地年鉴编纂者对乡村振兴部分的内容越来越重视，但重视程度有高有低，记录内容的价值参差不齐。

（一）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设置现状

笔者以重庆市的《巴南年鉴（2024）》《长寿年鉴（2024）》《江津年鉴（2024）》《永川年鉴（2023）》《铜梁年鉴（2023）》《荣昌年鉴（2024）》《梁平年鉴（2024）》《丰都年鉴（2024）》《垫江年鉴（2023）》《巫溪年鉴（2023）》10部年鉴为样本，梳理乡村振兴类目设置现状，探索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分目、条目设置框架。

10 部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年鉴名称	是否设类目	分目数 (个)	分目名称	条目数 (个)
1	《巴南年鉴（2024）》	否	1	乡村振兴	7
2	《长寿年鉴（2024）》	是	6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农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33
3	《江津年鉴（2024）》	否	1	乡村振兴	8
4	《永川年鉴（2023）》	是	7	农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农村水利、乡村治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41
5	《铜梁年鉴（2023）》	否	1	乡村振兴	7
6	《荣昌年鉴（2024）》	是	7	农村改革、农村经营管理、农产品品牌培育、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农村水利、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32
7	《梁平年鉴（2024）》	否	1	乡村振兴	5
8	《丰都年鉴（2024）》	是	4	综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乡村产业、村镇建设	17
9	《垫江年鉴（2023）》	是	3	农村综合改革、镇村规划、镇村建设	9
10	《巫溪年鉴（2023）》	否	1	乡村振兴	8

说明：1. 分目数未包括文章体综述
2. 条目数包括综述下的条目和分目下的概况，下文叙述中未包括概况条目

① 胡彦利：《政府工作报告入鉴编纂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23年第1期，第21页。

从上表可知，10部综合年鉴均记述了乡村振兴的内容。设置了乡村振兴类目的年鉴有5部，占50%；另外5部年鉴设置了乡村振兴分目，占50%。设置条目30个以上的有《长寿年鉴（2024）》《永川年鉴（2023）》《荣昌年鉴（2024）》3部，占30%；条目10个以下的6部，占60%。由此可见，综合年鉴记录乡村振兴内容的全面性有待提高。

（二）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1. 思想认识不足，内容份量不够

全市各地综合年鉴对乡村振兴内容的收录重视程度不一，普遍存在内容设置层级不高、着墨份量不足的问题，无法凸显当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在上述10部综合年鉴中，一半的地方综合年鉴把乡村振兴作为分目进行收录，例如《巴南年鉴（2024）》在农业农村类目设置乡村振兴分目，收录乡村产业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6个条目；《江津年鉴（2024）》在“农业农村·水利”类目设置乡村振兴分目，收录巩固脱贫成果、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创新经验7个条目；《铜梁年鉴（2023）》在“农业农村·水利”类目设置乡村振兴分目，收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发展、推动乡村建设、强化乡村治理、乡村振兴车间、农业农村改革6个条目。又如《梁

平年鉴（2024）》在“农业农村·水利”类目设置乡村振兴分目，收录乡村规划与建设、乡村治理、社会帮扶、脱贫成果巩固4个条目；《巫溪年鉴（2023）》在“经济”类目设置乡村振兴分目，收录项目投资与监管、政策衔接、脱贫成效巩固、社会帮扶、评估验收、试点示范推进、领导小组会议等条目。笔者认为，以上各年鉴的乡村振兴分目应该可以升格为类目，其中的大多数条目可以升格为分目。

2. 层次结构不清，内容交叉重复

乡村振兴部分收录的内容设置“五花八门”“百花齐放”，缺少相对规范统一的标准。如《××年鉴（2023）》设置“乡村建设”类目，下设农村综合改革、镇村规划、镇村建设3个分目。农村综合改革分目收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3个条目；镇村规划分目收录镇村规划编制1个条目，形成孤目；镇村建设分目收录镇村供水、村镇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农村客运4个条目。

有的年鉴乡村振兴类目收录的内容与农业篇收录的内容存在交叉重合。如《××年鉴（2024）》乡村振兴分目下的乡村产业振兴条目记述“特色产业方面，全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56.8万亩，产量21.86万吨，同比增长1.61%；水果种植面积9.69万亩，总产量8.15万吨，同比增长11.3%；蔬菜种植面积30.78万亩，产量60.27万吨，同比增长4.65%；

生猪出栏 22.1 万头,同比增长 6.83%;水产品产量 2.5 万吨,同比增长 6.37%。”在农业产业发展分目下的油料作物与经济作物条目中记载“全区蔬菜种植面积 2.05 万公顷,同比增长 2.87%;总产量 60.27 万吨,同比增长 4.65%。”“水果种植面积 9.69 万亩,水果年总产量 8.15 万吨,同比增长 11.3%,总产值 4.88 亿元。”畜禽养殖条目中记载“出栏生猪 22.1 万头,同比增长 6.8%。”水产养殖条目中记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2.50 万吨,较去年同期(2.35 万吨)增长 6.4%”。实际上,乡村振兴属于农村范畴而非农业范畴,应当与农业类目的内容进行区分。《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对“农村”的定义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对“农业”的定义是“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生产事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农业,还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村副业等项生产在内。”^①据此,上述内容可以纳入农业范畴,避免交叉重合。

有的年鉴把本应属于乡村振兴类目收录的内容设为另外分目进行收录。如《××年鉴(2024)》在“农业农村”类目设置乡村振兴分目后,又在同一类目下另外设置农业农村改革分目,收录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村“三资”管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三变”改革、农村宅基地

管理与改革、进城落户农民农村权益有偿退出改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 9 个条目。

3. 收集渠道单一,材料内容单薄

在编纂乡村振兴内容时,资料收集的方式比较传统,收集渠道较为狭窄,过于被动地等待相关供稿单位的供稿,缺乏主动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意识和能力。部分年鉴乡村振兴的条目内容较为空洞,大多是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资料缺少深度和广度。

三、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设置的建议

(一) 提高思想认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提升。提出到 2027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到 2035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进一步提高对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区、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960 ~ 961 页。

县地方综合年鉴应当单独设置乡村振兴类目，更好地展现乡村振兴战略在各地落实的情况，特别是要注意与农业类目区分的问题。几年前就有业内专家提出将乡村振兴的内容从农业类目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篇，这样的分类是更加科学合理的。实际上，乡村振兴属于农村范畴而非农业范畴，应当与农业类目的内容进行区分。重庆市各区（县）的地方综合年鉴对乡村振兴内容的收录逐步重视，截止到2024卷，多数区、县设置了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类目，只是分目设置有多有少，收录内容有厚有薄。

（二）拓宽资料来源

年鉴编纂工作者要杜绝被动、材料来源单一等情况，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出击收集乡村振兴方面的资料。可以收集各地党委、政府领导的讲话和调研报告、各地出台的文件、相关部门的工作总结和典型经验交流、各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和工作交流、相关新闻发布会内容等资料，从中整理形成一些特色条目。

（三）优化框架设计

就重庆市而言，大部分区、县地方综合年鉴单独设置乡村振兴类目的时间都不长，框架设计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从而更完整地记录相关工作，更清晰地反映年度地域特色。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笔者根据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

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要求、战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及全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情况，建议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的框架按照以下内容设置，供同仁参考。

地方综合年鉴乡村振兴类目设置分目：农村综合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人才培养、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农村公共服务、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分目。

各分目建议收录以下条目：农村综合改革分目可以收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条目内容；农村经济管理分目可以收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村产权交易、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等条目内容；乡村产业分目可以收录休闲农业、食品及农产品生产加工、农村电商等方面的条目内容；乡村建设分目可以收录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农村电力保障、农村寄递物流服务设施建设等条目内容；乡村治理分目可以收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农村网格化治理、阳光村务工程、平安乡村建设、村规民约等方面的条目内容；乡村人才培养分目可以收录高素质农民培育、乡村工匠培训、乡村“头雁”项目实施等方面的条目内容；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分目可以收录返贫风险防范、“两不愁

三保障”巩固、就业帮扶、消费帮扶等条目内容；农村公共服务分目可以收录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农村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条目内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分目可以收录农村垃圾处理、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水产养殖尾水处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秸秆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条目内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分目可以收录思想政治引领、文明乡风建设、农村文化服务、群众性文体活动、农村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条目内容。除此之外，各地可根据当地开展工作的实际情况设置一些特色性分目和条目。比如，没有单独设置水利类目的区县，可在乡村振兴类目设置农村水利分目，下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灌区建设等条目。

四、结语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如实记

载一个行政区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情况，是地方综合年鉴展示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编鉴为用”，年鉴编纂工作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读者。^①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不断地提升年鉴使用价值。乡村振兴作为类目在年鉴中设置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部分内容却十分重要，广大年鉴编纂工作者应当提高认识，加强学习，在海量资料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切实把乡村振兴类目编纂好，使之成为地方综合年鉴的一大亮点特色类目，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

（作者单位：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责任编辑：陈伟

^①吴朝庭：《基于关键路径法的年鉴编纂进步管理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19年第2期，第31页。

历代万县现存旧志述略

熊茂松

地方志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献史料，记载了一地的地理概况、文化习俗、城镇建设、社会变迁、历史人物、文学艺术等内容，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被称为“地域百科全书”，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历代以来，各地修纂了不计其数的地方志，但大部分已经散佚不可考。位于三峡地区核心区域的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现存旧志有以下几种，略述如下。

一、万县行政区划及其变迁

万县夏商时期属九州之一的梁州。东西周时期属巴国，秦汉时期属巴郡胸忍县。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占领巴蜀地区的刘备分胸忍县至羊渠县，治所在今万州区长滩镇，这是万县建县之始。蜀汉建兴八年（230），省羊渠县，改置南浦县，治所迁到今万州区南岸（约为今区政府所在地），西魏废帝二年（553），改南浦县为鱼泉县，治所迁到江北（今万州区北岸高笋塘），北周时期，先后更名鱼泉县为安乡县和万川县。隋朝开皇十年（590），又改万川县为南浦县。炀帝大业三年（607）南浦县

划归巴东郡。唐朝时期，武德二年（619）设置南浦郡，下辖梁山、南浦、武宁三县。武德八年更名南浦郡为浦州。贞观八年（634），改浦州为万州，这是万州得名之始。天宝元年（742）改万州为南浦郡，乾元元年（758）恢复为万州，治所与南浦县在同一地。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省南浦县入万州，仅辖武宁一县。明朝时期，洪武四年（1371），并武宁县入万州，六年，降万州为万县，一直到清朝末年，万县隶属于川东道夔州府，县名一直没有再发生改变，民国二十四年（1935），设立万县专区。

根据已有的文献，万县修志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当时万州名为南浦，刺史赵善赣主持修纂的地志书名为《南浦志》，不久，王子申在赵志的基础上再次修纂本地志书，更名为《南浦新志》。由于年代久远，这两部志书早已散佚，看不到任何有关史料。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查阅到两志的信息来自于宋代王象之（1163—1230）所著《舆地纪胜》一书，本书是一本节录当时全国各地的方志、图经而成的地方志性质

的著作。由于遗失了部分卷次的内容，后人将其留下的部分辑佚为《輿地碑记》，此书中记载了万县曾经在宋代修过两次志书。整个元明两朝时期，我们查阅不到有关万县曾经修志的记载，以“万县”为名字的县志第一次修纂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此志被保留了下来，一般被称为“乾隆《万县志》”。

二、乾隆《万县志》

乾隆《万县志》四卷。清刘高培修，赵志本纂。刘高培，生卒年不详，字台峰，江南（今江西）庐州府庐江县人，清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赵志本，字厚邨，顺天府大兴县人，清乾隆六年（1741）任万县县丞。另外，参与乾隆《万县志》编纂的还有万县儒学郭维城，巡检王永荣，进行采访和撰写文案的参与人员有万县典史吴琳，举人何淳、严圣义、黄岫等。清乾隆十一年（1746）刘高培任万县知县。高培到万县上任的第二天，接见本地绅士，在谈及本县县志时，众人皆言及县志未修，深为感叹。清朝建立 100 多年来，到乾隆时期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各地纂修地方志已是蔚然成风，然万县竟未有志，实为一件憾事。高培于是召集绅士，开局修志。对于此次修志的目的，高培在其序言中说：“仰观以合天时，府察以协地利，考稽往昔以穷其源，扶植将来以潜其委。”高培自拟了本志的内容如輿图、建置、沿革、山川、古迹、风俗、人物、艺文等目录，对修志的具体工作作了明确的部署。乾隆《万县志》

作为万县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由于没有史料可查，编纂者根据康熙和乾隆《夔州府志》有关万县的材料，加以斟酌取舍，“今所录者，夔志十之六七，增入者十之三四”，实际上，负责访问采写的材料不及一半，其卷次的设计为：

卷之一 序文、修校姓氏、凡例、輿图、沿革、分野、疆域、山川、古迹、形胜、风俗、名景、城池、公署、楼阁、驿递、铺舍、关梁。

卷之二 赋役、物产附盐法、祠庙、学校、坊表、坛遗、寺观、莹墓。

卷之三 秩官、宦绩、惠政、科贡、武功、武备、名贤、孝义、贞节、敕封、隐逸、侨寓。

卷之四 艺文、记、序、赋、诗、祭文。

乾隆《万县志》由万县知县刘高培进士主持修纂，在每一条目下，都列有小引，共计 36 条。每一条都列举前代有关本条内容的记载，或是摘引史书有关内容的记述。乾隆《万县志》强调征实，坚持凡是虚妄怪诞的不作登载，卑鄙邪恶的行径不作记载，不是本县的不作记载，做到宁缺毋滥，不如其他一些地方志，牵强附会，多方征引，以宣扬本县。同时，乾隆《万县志》注重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纲常名教，对于忠孝节义之事迹，不遗余力地宣扬，详细记载相关事实。在輿图的绘制上，稍显粗略，但也绘制了 25 幅万县地图，主要涉及的对象为城区、衙署、名景等，其中对于“万县八景”的描绘，较为用功，如都历摩天、天城倚空、白岩仙迹等，基本都能抓住要点，

突出特点。

乾隆《万县志》作为万县尚存的首部旧志,许多史料的文献价值自不待言。明末清初以来,发生在川东地区的连年战乱,对万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土著之民大多死于战争,外地移民大量涌入,进而改变了万县的风俗习惯,乾隆《万县志》“风俗”条记载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对本地的影响:“(国初)张、李、谭、吴四逆并兴横肆,荼毒万邑尤甚,嗟此土著靡有孑遗,今多外附之氓,刁顽健讼,大远文翁之世……考万邑自流贼凋残以来,五方杂处,楚民尤多,风俗难语淳朴矣。”万县历来为川东门户,进出三峡的要冲。由于三峡滩多流急,行程困难,处于长江三峡航道上的万县对于过往本地的船只设有救生红船,乾隆《万县志》记载:“红船十只,每只每年修造银六两,共银六十两……红船夫每只艄公二名,水手四名,共六名,通共六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银七两二钱,共银四百三十二两,随船铺陈,每年量造三副,每副估一十二两,共银三十六两,以二十四两造铺陈,十二两置轿伞应用。”将救生红船的数量、银两开支等记载得十分清楚,此条史料对于了解清代以来长江航运的情况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历史上,万县长滩作为本地唯一的产盐地,对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影响,盐业停顿,民生凋敝,清初政府恢复生产,万县盐业生产也再次恢复,国家也恢复了盐业税收。乾隆《万县志》

有详细记载:“万邑自前明以来,长滩旧有盐井,嗣罹兵燹,竟成淤塞。国朝于康熙五年就原淘凿,陆续报开。寻复古制,井列三等,引发灶户行销,居民就近买食……本邑长滩盐井,康熙五年报开,石框楠木二井,照上井例,每井征井课银一十二两四钱三分,共征井课银二十四两八钱六分。康熙五十四年报开,石板南溪二井,照上井例,每井征井课银一十二两四钱三分,共征井课银二十四两八钱六分。雍正二年报开,小井一井,照上井例,征井课银一十二两四钱三分。雍正九年报开,自明井一井,照上井例,征井课银一十二两四钱三分。雍正十二年报开,八角井一井,照上井例,征井课银一十二两四钱三分。乾隆八年报开,山门井一井,照中井例,征井课银六两。乾隆九年报开,凉水井一井,照下井例,征井课银四两一钱四分三厘。乾隆十一年报开,新开井一井,照下井例,征井课银四两一钱四分三厘。以上上中下盐井十眼,共征井课银一百零一两二钱九分六厘。通上,长滩新旧上中下盐井十眼……长滩十井,核配陆引四百七十二张,每张征税银计二钱七分二厘四毫,共征税银一百二十八两五钱七分三厘八毫。长滩十井坐落本邑南,治市郭里,距城七十余里,中隔岷江,引张例发各户,坐厂行销,以供市郭一里居民就近买食。”此条史料详细地记载了万县盐业在清初的发展情况。

乾隆《万县志》编成后,乾隆十一年(与乾隆《夔州府志》同时)即刊印,

但存本极少，今仅故宫藏有一部完好版本，属于珍稀方志，海南出版社1991年将乾隆《万县志》和其他稀有方志合辑，以故宫珍本丛刊出版影印本，编号为第217册。

三、咸丰《万县志》与同治《增修万县志》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万县知县丁凤皋（贵州开州举人），邀请巴县举人、万县县学训导龚珪续修县志，但不久丁凤皋即调离万县，龚珪也因病离世，续修县志就停了下来。咸丰二年（1852），万县知县王玉鲸（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人，武备院笔贴式，道光二十九年任万县知县）再邀请四川隆昌县举人、万县县学训导范泰衡续修县志。范泰衡，四川隆昌人，道光年间举人，咸丰元年（1851）任万县训导，第二年升任知县。范泰衡继续龚珪未完成的修志任务，在较短的时间里，初成志稿，巧的是，王玉鲸也因生病离职，续修县志之事再次搁浅。咸丰七年（1857），湖南长沙府解元冯卓怀来万任知县，继续关注县志的纂修，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冯卓怀在范泰衡志稿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编辑处理，随即木刻印刷，成书两册，即为咸丰《万县志》。咸丰《万县志》在编排体例上，因袭前志，设为四卷，分别为地理、职官、人物、典礼，10余个条目，内容简陋，流传不广，今仅存于南京图书馆。

清同治元年（1862），张琴由甘肃镇原县教谕升任万县知县。张琴，甘肃

武威县人，廪生。张琴继续延聘范泰衡增修县志，同治五年（1866）志成，是为同治《增修万县志》。同治《增修万县志》三十六卷，首一卷，附典礼备考八卷。前有范泰衡、张琴、王玉鲸所作序文，叙述修志有关情况及经过，另有刘高培和赵志本为乾隆《万县志》所作序文以及冯卓怀、丁凤皋、龚珪的序文，这对于我们了解清代以来《万县志》的修纂情况极有裨益。同治《增修万县志》目录下列序、修志职名、凡例和诸图，在绘制出的诸图中，保留了乾隆时期绘制的万县县衙和名景图，还增加了不少万县县城内部分建筑物图形。在划分卷次时，同治《增修万县志》分为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仕女志、艺文志五门68条纲目，约30万字，在其下按内容细分为二级卷次，具体如下：

天文志 卷一 星野。

地理志 卷二至二十一 建置、沿革（故城、废县）、疆域（形胜）、山川（大江、滩险）、城池（北山、石城、便民利济池）、公署（行馆、演武厅）、坛庙祠庙（民间祠庙）、户口（场集）、田赋（杂税、蠲振、仓储）、水利、学校（书院、义学、考棚、非宫）、风俗（义局）、物产、津梁、驿传、寨堡（碉洞）、关隘（防堵、粤滇逆贼、筹防经费、团练章程）、莹墓、坊表、寺观、古迹（碑碣）。

职官志 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历任、仪制、政绩。

仕女志 卷二十五至三十五 选举、仕进、叙衔、封荫、贤哲（学行、隐逸）、

宦绩（武略）、忠烈（义烈、孝义、救亲割股、累世积善）、义行、大年、列女、流寓。

艺文志 卷三十六 文（诗、赋）。

同治《增修万县志》在内容上以刘高培所修县志为底本，同时汇集《清一统志》《四川省通志》《夔州府志》以及其他史集关于万县的文献，编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广泛汇集文献，以便后人采用，汇集别的文献部分都注明出处，以体现事实皆有来源的编辑态度。在编者认为重要的内容上，如关隘、防堵、“粤滇逆贼”、筹防经费、团练章程等，完全悉数承续原志，不加修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体现重要性，另一个以备查办参阅。历代以来，志书旌表的人物都不著录存世者，同治《增修万县志》收录的人物“列女”也注意现存者不录，但孝子、孝悌、杀贼、割股疗亲等不在此列。体例上沿袭旧志，稍有变异，每一条目前的小序，比原志增加三分之二，新增的条目也加上小序，以体现编排的一致性。

同治《增修万县志》相比于前志，后出转精，在地理门中，山川、大江险滩、便民利济池、水利工程、义局、寨堡碉洞、关隘津梁、“粤滇逆贼”、筹防经费、团练章程等所载资料极为详尽，很多资料具有档案一样的性质，如义局会所的有关史料达到 5000 余字，寨洞记述了 400 余处 6000 余字。“艺文志”收录宋朝黄庭坚《西山留题》、宋末王师能《万

州天生城石壁记》、明朝郭棐《万县新修泮池铭并序》、张琴《马将军祠记》、范泰衡《万县重刻四种遗规序》等文，都是记载万县有关的人和事，价值很高。另外，同治《增修万县志》的职官、选举、人物等史籍，述及咸丰、同治年间农民起义军在川东的作战情况，内容也甚为丰富。但同治《增修万县志》在编排上也充分体现出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过分关注封建纲常名教，祀典内容过多，《典礼备考》分为上、中、下三卷记述，文献价值不高。讲求封建伦理下的妇女形象，“列女”记述内容也过于详尽，收载门类特别繁多，达 25000 余字。

同治《增修万县志》修成后，同治五年（1866）即有刻本，民国十五年（1926）万县图书馆补刻重印。同治十三年（1874），万县知县张焜（直隶广宗拔贡）曾续修县志，在同治《增修万县志》原有内容的基础上，采访编辑《万县志采访事实》一册，分为地理、职官、士女、艺文四个部分，下列 25 目，约 35000 字，主要的内容为近十年间的官职、选举、人物事迹，但内容简陋，未能刊行，后世刊印将这部分附录在后。

1992 年巴蜀书社出版同治《增修万县志》影印本，便于查阅，但有部分内容较为模糊，影响了其价值。另外，国家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地藏有同治十三年《万县志采访事实》，编著者为张焜，此本应该是同治年间万县志修纂时期各个修纂人员搜集整理的资料，只见抄本，未见刻本。

四、光绪《万县乡土志》

光绪《万县乡土志》分为九卷，不著修志人姓名，修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分为卷一：序、历史录。卷二：政绩录。卷三：兵事录。卷四：耆旧录。卷五：礼俗录。卷六：人类录。卷七：地理录、附图。卷八：物产录。卷九：商务录。光绪《万县乡土志》于民国十五年（1926）出版。缺少卷五和卷七，文献价值受到影响，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有1926年刻印本，其他地方未见馆藏。此志影响不大，流传不广。《中国地方志综录》收录有此志。

五、民国《万县志》

民国《万县志》二十三卷，首一卷。民国熊特生（1874—1949）总纂，刘孟伉（1894—1969）、施雨苍分纂。熊特生，号国彰，谱名焕崑，万县小周乡人，晚清举人，曾就读京师法律学堂，任黑龙江拜泉县知县，国民政府国史馆编修等职，后辞职在多所大学任教，民国初年，出任四川临时参议会议长，后回乡创办新式学堂，出任校长，著有《孔子衍义》《德育讲义》《族范志》等书。刘孟伉，四川云阳县人，书法家，诗人，著有《杜甫说解》等书。施雨苍，万县人。民国《万县志》最初于民国十三年（1924）由万县图志局局长刘乙青聘请同学史子年为总纂，负责纂修本县县志。民国十六年（1927），史子年去世，但志书并未完成，于是聘请晚清举人熊特生继任总纂，至民国二十年（1931），万县图志局撤销，设立文献委员会，此时，熊特生负

责修纂的万县志基本完成，但未能定稿。民国二十四年（1935），刘乙青去世，修志一事暂时停顿下来。继任万县专员兼县长罗经猷决定完成修志未尽事业，恢复了原有修志人马，聘请熊特生的侄子熊扬滋负责文献委员会，再次确认熊特生为修志总纂，同时，聘任刘孟伉、施雨苍为分纂，对已经修成的志稿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审定，统一了编排标准，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告竣。全志卷次目录如下：

卷首 序、凡例、目录、列图。

卷一 輿地 建置沿革、疆域、山水、区分、户口、厄塞、名胜、古迹。

卷二 营缮 城市、公署、学校、党会、义局、道路、桥梁、公共场所。

卷三 职官 文职上中下、武职、专员、法院、市政府。

卷四 财赋 田赋上下、杂税捐、地方附加、公款、公产。

卷五 食货 物品、钱币、农林、工艺、商岸。

卷六 物产 植物、动物、矿物、杂产。

卷七 教育 儒学、书院、教育机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卷八 交通 陆道、水道、航空、邮政、电政。

卷九 警团 警察、公安、团防、保安。

卷十 祠祀 秩祀、民祀。

卷十一 宗教 佛、道、回、天主、耶稣。

卷十二 选举 科贡、议员、大学专门毕业、仕进。

卷十三 人物一。

卷十四 人物二。

卷十五 人物三。

卷十六 人物四 忠义。

卷十七 人物五 孝友。

卷十八 人物六 义行。

卷十九 人物七 艺术。

卷二十 人物八 列女上中下。

卷二十一 人物九 流寓。

卷二十二 艺文 书目、金石。

卷二十三 大事。

民国《万县志》由熊特生作序，交代万县县名的由来，梳理从清代乾隆年间刘高培首先创修万县志，中经咸丰冯卓怀和同治范泰衡二人继续编纂的情况。回顾了万县从宋代赵善赣修《南浦志》、王子申修《南浦新志》的情况，介绍二人所修志书皆已亡佚，不见其篇目，仅可从王象之《蜀碑碣录》中记载，也说明本次修志时间距离上次志书修成已经六七十年了，而这正是此次修志的缘由。序中具体谈到了此次修志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谈到修志的辛苦，自己因过劳成疾，人老眼泪流涕不止，令人深感敬佩。还需要说明的是，民国《万县志》并不是旧志的续修，而是根据民国时期万县的具体情况，加入了更多全新的内容。志名虽为《万县志》，但志中引用旧志的文献并不多，而且都分别予以标明，或是刘（高培）志，或是冯（卓怀）志，或是范（泰衡）志，或是省志（通志），或是府志（夔州府志）。民国《万县志》修于民国时期，内容大多反映民国万县的各方面情况，虽“建置沿革”等仍然

沿袭旧志，但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民国时期新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卷二中的“城市、公署、学校、党会、义局、道路、桥梁、公共场所”条目内容，都是万县民国时期的状况。在教育中，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是民国时期新的社会现象。民国《万县志》很有价值的文献在于单独列出“宗教”为一卷，介绍民国时期万县佛教、道教、回教、天主教、耶稣教等宗教情况，是研究民国时期巴渝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参考资料，这在民国时期巴渝地区方志中比较少见，文献价值较高。民国《万县志》记载发生在1926年的“万县九五惨案”尤其详尽，将英帝国主义侵略炮击万县县城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对英帝国主义者进行了充分的揭露，表达了人民群众正义的呼声，所记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着重记载人物，按照旧志一贯的价值观念，宣扬封建正统的伦理纲常，大肆宣扬列女们的忠贞善行，赞扬忠义、孝友、义行等人物行迹，反映了编纂者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这也是民国时期地方志普遍的现象，内容上反映的是新的社会现实，思想观念仍没有脱离封建意识的影响，志书的体例也沿袭旧志，所以，仍然属于旧志的延续。

民国《万县志》修成后，即制版印行，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投身抗战，县政府对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文献整理已经力不从心，所以民国《万县志》流传不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偶

有传抄复印,今万州图书馆藏有刻印本,经重庆三峡学院图书馆整理后,有影印本电子版存世流传。

另外,根据笔者调查,关于万县的志书还有民国十五年(1926)杜焕章的《民国万县乡土志》,国家图书馆等地有藏。重庆图书馆藏有民国年间《万县图志四堡采访稿》和《再续万县志稿》,都为稿本,内容都不够精审完备,部分内容也模糊不清,价值受到很大影响。

六、结语

万县历来虽为长江进出三峡的咽喉要道,但由于地处内陆,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留下來的历史文献较少。自宋代以来,万县出现了方志文献,但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影响,清代以前的旧志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由于时间较近,清代所修几部县志都保存下来。

纵观清代到民国年间几部保存下来的万县旧县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初期县志内容粗疏,越到后面内容越丰富,体现出地方志文献“后出转精转详”的特点。二是每一部旧县志所登载的内

容都能反映其产生时代县域社会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乾隆本反映了万县清初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况,咸丰同治本则反映了清中期以来万县经历的战乱,民国本则系统书写了清后期到民国时期万县广阔的社会生活。三是民国本县志体例完整,内容精审,富有创意,登载的近代以来万县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出现的新事物,特别是诸如“九五惨案”、新的教育、宗教信仰等众多材料极具史料价值,此志以传统旧志的形式书写新的时代内容,是传统旧县志适应时代变化的典范之作。

近代以前,三峡地区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奉节(原名夔州),万县直到清末民初,被开辟为通商港口之后,逐渐成为三峡地区的经济中心,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才逐渐兴盛起来。清代保存下来的几部旧县志登载了较为丰富的地域文化史料,是研究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

责任编辑:陈伟

南宋“重庆府”得名真相探析

邓显皇

据《宋史·孝宗本纪》《宋史·光宗本纪》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初十，高宗禅让，太子赵昀即位，是为孝宗，封皇子赵惇为恭王。乾道七年（1171）二月初八，孝宗立赵惇为太子。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初二，孝宗禅位于赵惇，是为光宗。同年八月初七（1189年10月5日），光宗升恭州为重庆府，此即“重庆”得名之始。而“重庆”得名的大背景，则是源于两宋“潜藩升府”惯例。成书于南宋中期的《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五有“中兴以光宗皇帝潜藩升为重庆府，绍熙元年”的记载（只不过误把时间批注写成了“绍熙元年”即1190年）。《方輿胜览》卷六十有“皇朝因之，崇宁改恭州。以光宗潜藩升重庆府”的记载。但对于当时为何取名“重庆”，宋元文献却没有明确记载，这也造成了以后历代至今的各种猜测。笔者希望通过全面的梳理和严谨的探究，追溯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一、明代以来关于“重庆”得名的主要说法

明代以来至今，关于“重庆”得名

的说法主要有四。

（一）二庆之间说

即因重庆府地理位置介于顺庆府、绍庆府之间而得名。这是流传最久也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最迟在明代正德《四川总志》卷十三就出现了“以其地介绍庆、顺庆之间，故名”的记载，其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在至少400多年的时间里，历代官修志书或民间著述，但凡明确提到重庆得名原因时，均是一脉相承采用此说。

但检视南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六“顺庆府”和朱熹、赵师渊同撰《资治通鉴纲目》卷三十八、卷四十三以及元人编撰的《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五”有关记载，顺庆府原名果州（治今四川南充市），于宝庆三年（1227）升府。绍庆府原名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县），于绍定元年（1228）升府。二者都比恭州升为重庆府时间晚了近40年，即重庆得名时还没有顺庆、绍庆之名。因此“二庆之间”的说法明显是顾名思义，不过是以讹传讹数百年的笑话而已。

（二）双重喜庆说

即因赵惇起初被封为恭王，后来又即帝位，喜“庆”双“重”故而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 1941 年 10 月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发表《汉代的重庆》一文，其中字里行间透露出重庆是来源于“双重喜庆”的意思。虽然不排除卫氏也可能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但自此开始，这一说法便逐渐流行。目前已发现的“双重喜庆”说的较早资料，是赵廷鉴编著的《重庆》（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地理科普读本），该书在介绍重庆名称的由来时，称是因光宗赵惇“起初在恭州被封为恭王，后来又即帝位，喜‘庆’双‘重’故而得名”，虽没有说明论据，但其说源于卫氏观点可能性很大。此后，“双重喜庆”之说就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被广泛采信，大量用于各种官方和民间著述、宣传当中，最终俨然成为了“定论”，成为人们的共识。

此说虽然寓意美好，也是现在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说法，但只要稍微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说法仍然属于望文生义，明显站不住脚。首先，民国及以前无相关文献记载。在目前能见到的所有民国以前史料上，都找不到直接或间接记录、证明“双重喜庆”一说的文字，也没有学者通过专门的研究提出该观点，现在所有采用该说的地方，也都不能说明其出处。其次，由封王而后立太子再即位为帝是宋代绝大多数皇帝接班必经的三部曲。凡即位后升自己潜藩为

府的宋代皇帝，大都经历了先封王、机缘凑巧时再被立为太子，然后接任皇帝大位，谁不是几重喜庆？既然如此，为何光宗偏偏将自己潜藩“恭州”升为“重庆府”？第三，所谓“双重喜庆”间隔太远。赵惇封恭王是在孝宗即位的 1162 年，1171 年才立为太子，即皇位却是在 1189 年。从封王到即帝位之间经过了 27 年，即使从立太子到受禅登基也间隔了 18 年，不可能有好事重至的喜庆感，谈何“双重喜庆”，这明显是想当然的一家之言，经不起推敲。更何况光宗对父皇孝宗久无退意、迟迟不肯让位还心存疑惧，多次求助寿圣皇太后吴氏但未能如愿，猜嫌由此而生。第四，当时光宗还不宜向天下表达“喜庆”之意。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让位给光宗，理由是为了给高宗服丧，三年为期，当时只过了两年。服丧期间，皇家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暂停或从简。《宋会要辑稿·礼四五·宴享》记载：“淳熙十二年，泗州报来岁正旦、生辰，彼此权止一年。淳熙十五年、十六年，以高宗服制罢。”而光宗当年过生日，一开始也打算一切从简。《宋会要辑稿·礼五七·节》记载：“（淳熙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诏今年重明圣节，并乞依会庆节礼例，诸路州军止开启满散道场，不许排宴，亦未合用乐。自来年以后用乐。”因此，重庆府名中的“重庆”不可能是“再度庆祝”或“双重喜庆”之意。

进入本世纪以来，学界对重庆得名

进行了新探索。2008年12月,韩意和赵鼎发表《重庆得名详考》(见《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四期),对“双重喜庆”和“二庆之间”这两种说法分别提出了质疑和否定。

(三) 反复颂祝说

亦即“诗经郑玄笺”说。唐冶泽在《“重庆”得名新考》中提出此说(见《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在指出当时似乎存在使用“重”“庆”两字偏好后,认为“重庆”一语,其典出《诗经·鲁颂·閟宫》,全诗歌颂鲁僖公继承祖业,中兴鲁国,收复疆土,四夷宾服的功绩,其中唱道:“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郑玄笺注曰:“此庆僖公勇于用兵,讨有罪也……此又庆僖公勇于用兵,讨有罪也。中时鲁微弱,为邻国所侵削,今乃复其故。故喜而重庆之。”这里的“重庆”是指反复颂祝鲁僖公,歌颂他让鲁国强大起来并祝他长寿幸福。光宗取此名的意思就是表明自己要学鲁僖公,继承孝宗未完成的事业,光复被金人占领的半壁河山,中兴宋室并祝孝宗长寿安康。因此,将恭州命名为“重庆”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地位是完全一致的。唐冶泽先生据此认为,这才是“重庆”的本来含义。

(四) 祖父俱存说

即“四世或三世同堂”之说,认为“重庆”指祖父母和父母俱存,延伸为祖辈和父辈“三世”以上家庭同居一堂的情形。这一词义盛行于宋明时期,今已不用。

重庆本地学者李正权在2014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地名杂谈》中首次提出此说,何江在《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刊于《长江文明》2019年第4期)一文中进一步认为,“重庆府”之名来源于光宗为贺寿圣皇太后吴氏寿辰,依照民间将厅堂更名为“重庆堂”的习俗,将自己的潜藩恭州升为“重庆府”。

二、追根溯源解析南宋“重庆府”得名由来含义

(一) 两宋潜藩升府之特殊考量

史志界历来对重庆府系潜藩升府并无争议,而潜藩升府为两宋惯例。据统计,宋代潜藩升府就有44个。潜藩即皇帝为皇子时所封官职或王侯的州,取义《易经》里的“潜龙勿用”,寓意皇帝的“龙潜之地”。北宋时,州升格为府,前提条件必须是节度州,至南宋时这一条件逐渐放宽,不是节度州的潜藩也纷纷升格为府,一些非潜藩州,也因为皇帝的诞生地、驻蹕地而升格为府,比如高宗驻蹕地杭州、越州分别升为临安府、绍兴府。这些情况都表明,一个地方若与皇帝之间存在特殊关联,将会受到朝廷不同一般的待遇。然而,皇帝在位期间也不是一定要将自己的所有潜藩都升格为府,比如,高宗在位时没有将潜藩蜀州(治今四川崇州市)升府,孝宗在位时没有将潜藩剑州(治今四川剑阁县)升府,光宗在位时也没有将潜藩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升府。

升州为府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政区设置调整,但由于潜藩与皇帝之间的特

殊关系，潜藩升府有时还被赋予了特殊内涵。通过梳理分析，发现两宋潜藩升府存在以下三种特殊情形是由朝廷直接决定，勿需地方申报，这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1. 潜藩升府庆贺生日。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放大镜再放大一点，还能看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自北宋元丰三年（1080）开始，两宋皇帝即位后把自己当皇子时赐封的州升为府较为常见。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十月二十二日将自己封王时的潜藩建州升为建宁府。十月二十二日也是孝宗的生日，这一天被定为“会庆节”，每逢节至，宫廷都要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在自己生日这天，将潜藩升格为府，难免不让人认为，孝宗借此来庆祝自己的生日。第二年即隆兴元年（1163），十月二十五日会庆节期间，孝宗再次将潜藩洪州升为隆兴府。宁宗生日是十月十九日，其在庆元元年（1195）十月十四日升自己的潜藩英州、舒州、嘉州分别为英德府、安庆府、嘉定府。理宗生日是正月二十六日，绍定元年（1228）正月二十三日升潜藩成州为同庆府，升黔州为绍庆府。由此看来，潜藩升府的时机和用意，经常会与祝寿庆生联系在一起。

2. 潜藩升府彰显孝道。宋朝因其特殊的立国背景，建国之初就实行“以孝治天下”。徽宗曾追升11个父亲或先祖潜藩为府，以标榜孝道，这一做法在南宋时得到了效法。淳熙四年（1177），孝宗已在位15年，六月十五日追升高宗

潜藩蜀州为崇庆府（高宗曾封蜀国公）。绍熙元年（1190）九月十日，光宗升孝宗潜藩剑州为隆庆府。光宗生日是九月四日，通常庆寿活动在前后数日，九月十日仍属重明节庆期。在自己生日时不升自己的潜藩，而唯独追升父亲潜藩，其中明显透露出对父亲的感恩、恭敬和孝道之心。庆元元年（1195）十月十四日，宁宗追升孝宗诞生地（同时为宁宗潜藩）秀州为嘉兴府，此举意在昭告天下，标榜孝道以稳定民心（由于拒绝主持孝宗丧礼，导致皇家的道德权威性受到质疑，朝野出现混乱局面，光宗被逼退位，太子赵扩继位，是为宁宗，改年号为“庆元”）。由此类推，孝宗升蜀州为崇庆府，也是在向高宗表明心迹、彰显孝道，是年高宗已71岁（虚岁）。绍定六年（1233）二月，理宗追升荣州为绍熙府，大概也有向天下表明对祖父光宗的孝敬之意，皇室稳才能稳天下。

3. 潜藩升府预示立储。北宋时，宋真宗先封六皇子赵受益为升王，同月又升升州为江宁府，六个月后升王被封为太子，赵受益就是后来的仁宗赵祯。徽宗先封长子赵桓为定王，后又升定州为中山府，赵桓就是后来的钦宗。后人将此解读为，真宗、徽宗升州为府来预示储君（南宋岳珂《愧郈录》卷八：“盖圣意欲以为豫建之端倪也”）。

综上所述，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州升府的人为因素逐渐代替了原有的规则，州作为皇帝潜藩的私人属性凸显，升什么州和什么时候升，乃

至取什么名字，都暗含着皇帝深层次的考量。

（二）南宋重庆府应读作“重（zhòng）庆府”

在古代，县级政区重名或同音比较常见。但自东汉末实行三级政区制开始，一国版图内二级政区重名或同音几无可能，即便在分裂或割据政权之间存在，江山一统后也会及时予以处理。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高宗将潜藩蜀州升为崇庆军节度。孝宗淳熙四年（1177）六月，升崇庆军节度为崇庆府。十二年后，恭州升为重庆府。这两件事相继发生且间隔时间短，加之“重庆府”与“崇（chóng）庆府”均为二级政区，且皆隶属川峡四路，更不可能完全同音。再考虑到“重庆”一词极有可能是“重（zhòng）闾具庆”的缩写。古代遗留下来的科举档案中，进士科考生填报个人简历时，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祖父俱在曰“重庆下”，有的也书“重闾具庆下”，如《清代硃卷集成》（上海图书馆珍藏，顾亭龙主编，1992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就出现两处“重闾具庆下”，其中：“重闾”旧称父母或祖父母，这里就是指代祖父母，因为紧随其后的“具庆”指代父母，“重闾具庆”的含义就是祖父母与父母俱存。据此，重庆府的“重”，其最初无疑应读作“重（zhòng）庆府”。因此，重庆府名中的“重庆”不可能是“再度庆祝”或“双重喜庆”之意。元代以后，崇庆府降为崇庆州，隶属成都府。而“重（zhòng）庆府”则约定俗成读作“重

（chóng）庆府”，“重”本来就是多音字，这样误读并无不可。更何况元代“重庆路总管府”与“崇庆州”已非同级政区，即使专名同音，也不再是问题。

（三）“重庆府”得名之真相

解析“重庆府”得名真相，首先有四个问题摆在面前，需要我们解开隐藏其中的迷雾。

一是光宗为何安排自己的潜藩恭州优先升府？光宗在位期间，仅有两次潜藩升府，一是即位当年（1189）八月初七升自己的潜藩恭州为重庆府，二是绍熙元年（1190）九月十日升父亲孝宗的潜藩剑州（普安军节度）为隆庆府。什么时间升府，升谁的潜藩为府，寄托什么样的意愿，光宗肯定有自己的考虑。他为何安排自己没有节度军额的潜藩恭州优先升府？毕竟是父亲孝宗禅让皇位于他，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升格孝宗的潜藩剑州为府以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感恩、恭敬、孝道更重要？

二是光宗为何要将没有节度军额的恭州直接升为重庆府？南宋四朝大臣洪迈在讨论宋代设府时，本朝“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可见按照规定，宋代升州为府，应先有节度军额名，只有节度州才能够升为府。但他随后又指出：“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容斋随笔》卷十二，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容斋随笔》第

773页。)《輿地纪胜》卷一百六十载:“旧制天子即位,当所领州镇自防御州而下皆升军名,若节镇州则建为府。”但重庆府是第一个例外,历史上恭州从来就没有叫“重庆”或其他名字的军节度(经重庆本地学者何江考证,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末元初《大元混一方輿胜览》中的“重庆军节度”实为“崇庆军节度”),但却能直接升为重庆府,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提出了这个疑问。光宗为什么要率先破例,使重庆府成为首个建府时无节度军额,建府后也未追赐节度军额(即“建节”)的府呢?

三是光宗为什么不以年号命名潜藩?年号府名基本贯彻了南宋历史,绍兴元年(1131),高宗以年号为越州升府改名为绍兴府,此为宋代第一个年号府名,此后的孝宗、宁宗、理宗、度宗皆依此例,把自己即位改元后的新年号用在潜藩升府改名上,除了具有纪念意义,还在最大程度上强调和体现府与帝王之间的紧密联系。恭州系光宗即位后首次升府,完全可以按照祖父高宗、父亲孝宗做法,待新年号产生后再以自己年号命名潜藩。光宗之后连续三代皇帝宁宗、理宗、度宗均是即位或改元后以年号命名潜藩,但光宗却是个例外。

据《宋史·光宗本纪》,光宗有三个潜藩,分别为荣州、(熙州)镇洮军节度、恭州,其中(熙州)镇洮军节度在南宋建炎四年(1130)后为金国实际控制,宋孝宗即位后授皇子赵惇为镇洮军节度使应属虚封,表明其收复大宋故

土的决心。光宗在位期间并未将荣州升府列入议事日程(荣州于绍定六年,即1233年升为绍熙府,但那已经是光宗孙子理宗的时代了,远在恭州升府之后),恭州作为唯一升府的潜藩更应该以年号命名。为什么光宗不以年号为恭州升府命名?如果说1189年光宗刚即位时仍沿用父皇淳熙年号,新年号尚未产生,那为什么不等待新年号产生之后再进行潜藩升府?这其中必有缘故。

四是当时是否存在对“重”字或“庆”字的偏好?历史上,以“重”字命名的地名非常少,作为年号名的也很少,“重”字并不是一个古人的常用字。孝宗、光宗时期,对“重”字使用似乎存在某种偏好,比如重华宫、重明节。然而就在光宗的时代,民间对“重”字却并不看好。元代佚名《东南纪闻·卷二》记载,光宗昭告天下立重明节后,当时有民间术士对人说,这不是一个好名字,因为将“重”字拆开是“二千日”,非长久之意,听到的人很惶恐,立刻捂着耳朵跑开了。此后发生的事果然不幸言中,光宗在位只有六个年头,算起来正好近“二千日”。这个故事固然可能是后人附会,但体现了部分人对“重”字的一种看法。“庆”字倒在宋代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出现在人名中,呼延庆、西门庆等;出现在寺院名中,福庆寺、积庆寺等;出现在年号中,宝庆、开庆等;还大量出现在新命名的地名中。两宋潜藩升府44个,其中带“庆”字的14个,除北宋肇庆府(兴庆府)、袭庆府、庆阳府带“庆”字外,

南宋则多达 11 个，大多寓意“喜庆、吉庆、庆祝、庆贺”等。但恭州升府之时正值高宗三年丧期，当时的光宗还不宜向天下表达“喜庆”之意。

在古代，民间对地名的取名可能比较随意，但是地方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取名均由朝廷决定，更确切地说由皇帝决定，两宋升州为府，在《宋史》皇帝本纪中记录年月日就是有力的证据。既然皇帝有最终决定权，那么就可能在地名中注入自己的某种寄托和愿望。事实上，在宋代，其对府名的选定，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且涵义颇为讲究。比如南宋嘉定方志就记录了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八月丁丑（29 日）润州升为镇江府的过程（见〔南宋〕卢宪编纂《嘉定镇江志·卷一》），先由时任润州知州林虞（音“句”）上书朝廷，奏请皇上将润州升格为府，“以上崇于国体，下慰于民心”。八月丁丑，徽宗下诏曰：“聿新府名，用诏万世，可升润州为镇江府”，并明确指出潜藩升府是“以潜邸之旧藩，建大府之美名”，而新取的府名，既要“为邦人之显庆”，又能彰显“朕志”。又如，在严州方志保存的咸淳元年（1265）建府札记（见〔南宋〕郑瑤、方仁荣同撰《景定严州续志·卷一》）中，就详细记载了度宗继位后温州、严州、宜州、忠州这四个潜藩升府确定府名的过程。当时最初议定以年号“咸淳”为名的，是度宗初为刺史时的封地温州，而忠州原拟升为兴龙府。经过官员的复议，认为“温州拟为咸淳府，近郡称谓稍生”“忠州

拟升兴龙府，所称犹觉未妥”，于是改温州为瑞安府，而把“咸淳”二字赐给度宗封王之地忠州。由此可见，“重庆”这个府名的确定，当时南宋朝廷也一定是经过了反复斟酌，而不是突发奇想。周珣在《传承、纪念与寄托——宋代府名浅析》（见《东岳论丛》2016 年第四期）中对宋代建府取名方式进行了梳理，归结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原来的州名、郡号、节度军额或所辖县名等基础上取新名，突出地名文化的传承；二是直接以皇帝的年号命名，纪念新的纪元；三是以更有深意的名词替代原名，寄托皇帝的良好意愿。总的来看，新府名要么与当地历史文化关联，要么与皇帝关联，绝不是随意为之。

恭州找不到与“重庆”或“重”字有关的地名渊源（恭州时领巴县、江津和璧山三县），再排除年号方式，只剩下皇帝的“寄托”之意。既然如此，那重庆府之“重庆”究竟寄托了光宗什么样的意愿呢？笔者认为：

第一、光宗升恭州为府，旨在祝贺吴太后寿辰。

（1）光宗升恭州为重庆府属于潜藩升府。如前所述，宋代共有 44 个州因潜藩升府，其中就有恭州升为重庆府，南宋《舆地纪胜》卷一百七十五和《方輿胜览》卷六十均有明确记载，史志界对此亦无争议。

（2）庆贺生日是两宋潜藩升府特殊诱因之一。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后，相继将自己的潜藩建

州、洪州分别升为建宁府、隆兴府，以庆贺生日。光宗之后的宁宗、理宗均于自己生日之际升自己的潜藩为府。庆贺生日成为当时潜藩升府的特殊诱因之一。

(3) 恭州八月升府与吴太后生辰同月并非巧合。

恭州升府于光宗即位半年之后的当年八月初七，既不是光宗二月登基之时，也不是自己或父亲出生月份（据《宋史·本纪》，光宗生日为农历九月初四，孝宗生日为农历十月二十二日），更不是年底即将改元之际或其他月份。而八月二十一日是光宗祖母寿圣皇太后吴氏（以下简称“吴太后”）生辰（据《宋会要辑稿·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两者之间间隔不到半月，看似巧合，实则不然。

吴太后是光宗最为尊崇的长辈。宋代推崇孝道教化，奉行尊老国策，更何况吴太后对光宗来说甚为重要，吴太后曾帮助光宗劝说孝宗禅位，光宗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高宗和吴太后的强力支持。因此，无论基于辈分还是个人感情考量，向吴太后表达感恩无疑优先于向父亲表达心意或庆贺自己的生日。

庆祝吴太后寿辰是当时皇家大事。高宗去世后，吴太后是皇家辈分最高、最受尊敬的人。因此，庆祝吴太后寿辰成为当时皇家极为隆重的一件大事。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就在重庆府得名的当月，赵宋皇室最受尊崇的老人吴太后（因当时孝宗还在世，故不称“太皇

太后”。直到孝宗去世，光宗才尊吴氏为“太皇太后”），迎来了74岁寿辰。

《宋会要辑稿·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绍熙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寿圣皇太后生辰，皇帝诣慈福宫上寿。每岁如之。”但庆祝吴太后生日的工作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开始筹备了。《宋会要辑稿·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淳熙十六年（1189）七月三日，诏皇太后生辰奉银三万两、金五百两，令左藏西上库依例排办投进。”

破例升府祝寿更凸显尊崇和感恩。恭州在等级上属下州，在州格上属军事州，均地位垫底。若按照惯例，原则上应先将恭州升为军节度再升为府，间隔不会少于一年。当然还可效法真宗朝以升州为江宁府并置建康军节度特例，在恭州升府的同时赐予军额，但光宗在位五年多，始终没有为重庆府“建节”。若要命名为绍熙府，亦需待光宗在即位当年十一月决定改元绍熙后。虽然仍处于高宗三年丧期内不行上寿礼，但生日还是要过，祝寿还是免不了的。鉴于吴太后在光宗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鉴于这是自己即位后吴太后所过的第一个生日，因此，除照例进奉生辰金银外，即使恭州没有节度军额，即便前代已有年号府名的惯例，光宗皇帝仍然赶在即位当年吴太后寿辰前夕，就把自己的潜藩恭州直接升格为府，以别具一格的形式祝贺吴太后寿辰，让吴太后更充分感受到光宗对她的尊崇和感恩。

由此看来，光宗还是一个蛮有创意

的皇帝，为了给祖母吴太后贺寿，他打破非节度州不能升府惯例以及高宗、孝宗两帝年号府名和孝宗升府庆贺自己生日成例，虽然恭州等级和州格地位垫底，仍然直接将恭州升为府以庆贺吴太后生日，充分表达了他对吴太后的尊崇和感恩。

第二、恭州升府命名为重庆，有其特殊缘由。

(1) 光宗朝官方文书、大臣奏议不乏“重庆”一词，常用以指代吴太后。在宋代，“重庆”有时可以作为名词，指代的就是祖父母。宋代张纲作《满庭芳·生日》“十月风光，小春时候……更那堪，高堂重庆兼全，占取人间乐事，何必羨，玉带貂蝉”，其中“高堂”是父母，“重庆”指祖父母，如果他们都健在，那就是人间快乐之事，何必羡慕高官和美女呢。再如，宋代无名氏作《满江红·阳律方回》“重庆蓬弧呈瑞旦，盈门喜气先洋溢”，“蓬弧”是指初生的男孩，意思是祖父母和新生的孩子都带来了吉祥，整个家门都洋溢着欢喜的气氛。

光宗继位后，鉴于其祖父高宗已去世，一些官方文书、大臣奏议中数次出现“重庆”一词，明显是指代吴太后。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替丞相周必大起草了一个贺表《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贺三殿受册表》（见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南宫表笺”）有云：“重庆有光，仰东朝之慈爱；双亲并奉，极北内之尊荣。”贺表第一句第一个词，就强调了

“重庆”。这句话的大意是：祖宗福泽的绵延光大，仰赖于皇太后（东朝）的慈爱；精心奉养双亲（指孝宗和寿成皇后），让他们享受重华宫里（皇帝居大内，孝宗居重华宫在大内之北，也称北内）最极致的尊荣。虽然这一句是从丞相口里说出，但表达的却是光宗对吴太后和孝宗夫妇极致的感激和尊敬。据明代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四记载，绍熙三年（1192），起居舍人陈傅良向光宗进言：“今陛下上有重庆之亲，以慈俭闻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敬闻两宫，三朝累世、旷古所无。”绍熙五年（1194），吴太后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这是邦家之大庆。为庆祝吴太后寿辰，绍熙四年（1193）十一月二十日，光宗为吴太后送上尊号“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册文曰：“皇帝臣惇，身见三世，再逢揖逊，举禔仪，于以侈大庆而章盛德，其可已乎……今者申辑閤休，增崇丕号，又孰有大于此者乎？伏愿殿下对越嘉会，昭迪令猷，协海宇之欢心，袭宫闈之重庆，永膺寿嘏，绥于圣父，以施于孙子，同垂万世无疆之休，岂不赍歆！臣诚欢诚忭、稽首再拜，谨言。”

(2) 确定升恭州为重庆府，彰显了光宗对吴太后的崇高礼遇。

如前所述，在光宗朝官方，“重庆”有时就是指代吴太后。宋光宗虽有三个潜藩，但恭州系其被封为恭王之后的潜藩，地位明显比此前的荣州刺史和虚封的（熙州）镇洮军节度使更重要。因此，升恭州为重庆府，而不是升荣州为府（熙

州为金国实控，不可能升府），府名“重庆”而不是以年号“绍熙”或其他词语命名，旨在明确告诉天下臣民，“重庆府”是光宗为祖母吴太后定制的专属礼物，只有吴太后才能享受这样的礼遇。

（3）升恭州为重庆府，亦是与民间将厅堂改名“重庆堂”贺寿习俗互动。当时民间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通常会在给家里老人祝寿时，把自己家的厅堂改名叫做“重庆堂”。宋代释德洪在《吴子薪重庆堂》里写道：“堂中二老斗康强，夫妇承颜荐寿觞。竭（音切）来儿侄俱登第，举族请名重庆堂。”而光宗所在的赵宋皇室，正因为吴太后健在，恰好是一个四世同堂的皇家。因此，在吴太后寿辰即将来临之际，鉴于皇家没有“堂”，只有“府”才能与“重庆堂”相适配，光宗不可能将皇宫改名“重庆府”，遂把视同自己另一个“家”的潜藩恭州升为“重庆府”以示庆贺，向天下弘扬孝道，以争取民意支持，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光宗虽贵为皇帝，却始终担心被太上皇孝宗废黜）。这样看来，光宗还是一个工于心计的皇帝。

综上所述，“重庆府”应是宋光宗送给祖母吴太后的特殊生日礼物，意在深情地祝愿吴太后尽享人间极致的福庆，

并向天下臣民标榜赵宋皇室四世重庆，还间接表达了宋光宗定会延续国家中兴的志向。

三、还原“重庆府”得名真相的时代意义

古人对“重庆”十分推崇，认为四代或三代同堂、家庭圆满是一种福气。比如，南宋杨万里《题曾景山通判寿衍堂》有“人家具庆已燕喜，人家重庆更可伟”，明代杨荣《重庆堂为御史崔仲玉赋》：“君家积善肇庆源，云初奕叶森相传。一门四世总无恙，自是五福能兼全。嗟哉重庆世罕有，伟矣君家德深厚。勉旃忠孝两无亏，岁岁高堂介眉寿。”明代陈璘《番禺施氏重庆堂》“高堂重庆寿期颐，四世团栾世所稀”。晚清重臣曾国藩也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见《曾国藩家书·理财篇·致诸弟·述接济亲戚族人之故》。）因此，“重庆府”这个名字蕴含了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和家国情怀。还原“重庆府”得名的真相，对于我们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复兴责任担当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作者单位：万州区政协）

责任编辑：熊蜀黔

荣昌区建置沿革考

滕新才

荣昌县的前身昌元县，乾元元年（758）随昌州设置，为附郭县。北宋时享有“海棠香国”美誉，至明清仍长盛不衰。洪武六年（1373）正式设荣昌县，取“繁荣昌盛”寓意。清、民国因之。2015年撤县设重庆市荣昌区。

一、昌州初设

荣昌地域在《禹贡》时代属梁州，西周至战国属巴国。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灭巴国，周赧王元年（前314）设巴郡，荣昌地属巴郡江阳县（今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垫江县（今重庆市合川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置犍为郡，荣昌地属该郡资中县之东境、江阳县北境、巴郡垫江县西境。汉顺帝永建中，析资中县南境置汉安县（今四川省内江市西），荣昌地属江阳、汉安二县，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代辖地未变。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十道，荣昌地属剑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增加为十五道，

荣昌地少部分属剑南西道，绝大部分属剑南东道。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门下省左拾遗李鼎祚鉴于本地“山川阔远”^①，奏请割泸州（治今四川省泸州市）、普州（治今四川省安岳县）、渝州（治今重庆市渝中区）、合州（治今重庆市合川区）、资州（治今四川省资中县）、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六州交界地，另置昌州，得到朝廷批准。昌州正式设立，治狮子坝（今荣昌区盘龙镇昌州村），领昌元、静南、大足三县。其中昌元县是附郭首县，故名“昌元”。这是荣昌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行政建制，迄今已达1267年，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古城。

关于昌州和昌元县的建置时间，史书颇多歧异。最早披露信息的是《元和郡县图志》，记李鼎祚建议“置昌州”之后，紧接着有一句“寻为狂贼张朝等所焚，州遂罢废”，未交代具体时间。《太平寰宇记》补充为乾元二年：“至二年，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昌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867页。

张朝、杨[子]琳作乱，为兵火所废。”^①据此可知，昌州及所辖三县确曾建立，时间是乾元元年，第二年即因兵乱焚毁，仅维持了大约一年时间。所辖三县具体情况如下：

昌元县，中，东至州一百二十里，乾元元年与州同置。东接赖波溪，西邻耶水。

静南县，中，郭下，乾元元年与州同置。

大足县，下，西南至州六十五里，乾元元年与州同置。东临赤水，西枕荣山。^②

此处提及的赖波溪，又作“赖婆溪”，今荣昌区濑溪河的古称，其方位、道里与现地基本吻合。

但昌州毁于乾元二年这个时间存疑。史载泸州刺史杨子琳伙同泸水蛮（唐宋时期对金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称呼）酋帅张朝，趁剑南西川节度使崔旰进京朝觐，率精骑数千人突袭成都，蜀中由是大乱。此事并非起于唐肃宗乾元二年，而是唐代宗大历三年七月初一（768年8月17日）：“（大历）三年……七月壬申，泸州刺史杨子琳反，陷成都。”^③局势十分危急，唐代宗赐崔旰改名为“宁”，

授检校工部尚书，令其火速回成都，组织兵力平叛。杨子琳大败，收拾残兵沿长江东下，入据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昌州为泸州北面近邻，在杨、张西奔东窜的兵祸中，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战乱频仍，兵燹连年，大历四年（769），昌州及附郭昌元县不得已迁往赖婆溪畔赖婆村，即今荣昌区河包镇所在地。

昌州……旧理赖婆溪南，以昌元县为倚郭。

赖婆溪，在（昌元）县南五十步，源自静南县来，多有石磧，不通舟行。因赖婆村为名，旧为州所理。

赖婆山，在（昌元）县南九十里，四面悬绝。大历四年在山上置行州。^④

大历六年（771），昌州建制被撤销，“州县废”^⑤，所领各县仍还旧属，昌元县划归资州。大历十年（775），崔宁权衡形势利弊，奏请复设昌州，藉此“以镇押夷獠”^⑥。昌州不仅复置，还一度仿唐玄宗时地方行政体制，更名为“昌元郡”^⑦。为壮大昌州地盘，增强抵御“夷獠”的实力，第二年又分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西部另置永川县，“枕侯溪水，山川阔远，因名永川县”^⑧。至此，昌州

①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昌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746页。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昌州》，第868页。

③欧阳修：《新唐书》卷六《代宗纪》，中华书局，2011年，第174页。

④《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昌州》，第1746～1747页。

⑤《新唐书》卷四十二《地理志六·昌州》，第1091页。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昌州》，第867页。

⑦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一《梓州路·昌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2页。

⑧《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昌州》，第1747～1748页。设置时间据《元和郡县图志》：“永川县，下，西至州九十里，大历十一年置。”

领县增至四个，新建的州城“南凭赤水，北倚长岩，极为险固”^①，在晚唐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形势下稍可雄峙于一方。

上述文献可清晰揭示昌州从乾元元年设→大历六年废弃→大历十年复置的历史线索，此后则晦涩不明。北宋以下，《元丰九域志》《方輿胜览》《大元混一方輿胜览》《寰宇通志》皆含混其词，仅《大明一统志》略缀数语：“荣昌县……唐置昌元县，为昌州治。后州徙治大足。”^②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照录全文，且误作“后周徙治大足”^③。据多家记载，昌州迁治大足县的时间有两说，或谓唐僖宗光启元年（885），或谓唐昭宗景福元年（892），绝非五代郭氏后周时期（951—960）。“后周”实为“后州”音讹。万历《重庆府志》、郭子章《郡县释名》、陆应阳《广輿记》、曹学佺《蜀中广记》诸书，直至康熙《四川总志》，皆语焉未详，洵为遗憾。

最早的唐朝正史《旧唐书》，并无昌州及其属县的专门记载，只在“资州”附带一句：“乾元二年正月，分置昌州，寻废也。”^④这句话导致昌州设置时间出现异说——乾元二年（759）。此后，历代学者基本上沿袭乾元元年说、乾元二

年说演述史事。

乾元元年说除前述《元和郡县图志》外，还有乐史《太平寰宇记》、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大清一统志》、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道光《重庆府志》、乾隆《荣昌县志》、同治《荣昌县志》、光绪《荣昌县志》10种。

荣昌县……汉犍为郡资中、江阳、巴郡垫江三县地，唐初为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之界。乾元元年分置昌州，兼置昌元县为州治。大历六年废，十年复置，属剑南道。光启元年徙州治大足，以昌元为属县。^⑤

乾元二年说除《旧唐书》外，另有《新唐书》《唐会要》《輿地广记》《輿地纪胜》《读史方輿纪要》5种。

荣昌县……本内江县地，唐乾元二年析置昌元县，并置昌州治此。大历六年州废，县属资州。十年复置昌州治此。光启初州徙治大足，县属焉。^⑥

两说孰是孰非？南宋王象之曾做考证：“象之谨按：李鼎祚奏乞置昌州在乾元元年，《唐会要》载建置昌州年月在乾元二年，而《寰宇记》乃以为乾元二年州遂废。既新置于二年，不应于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昌州》，第867页。

②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九《四川布政司·重庆府·荣昌县》，巴蜀书社，2018年，第3085页。

③刘大谟、杨慎：《嘉靖四川总志》卷九《郡县志七·重庆府·荣昌县》，《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

④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1677页。

⑤蒋廷锡：《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四川布政使司·重庆府·荣昌县》，乾隆九年（1744）刻本。

⑥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九《四川四·重庆府·荣昌县》，中华书局，2005年，第3277页。

当年遂废。使二年为贼所焚，亦不应至六年始废也。如昌州以乾元元年李鼎祚奏请，二年建置，大历六年为贼焚荡而废，至大历十年而复置，其年月初不相乱也。”^①清末张驹贤据此锤定：“《新书》作‘二年’，《会要》云‘二年正月’，王象之曰‘元年奏置，二年建州’，甚得事实。”^②其实未必如此。王象之的考证，并非以无可辩驳的文献记载为基础，而是基于“既新置于二年，不应于当年遂废”的揣度之辞。在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有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中晚唐乱世，什么事都可能意想不到地猛烈爆发。李辅国一场宫廷政变，就可以把唐肃宗送上绝路，皇帝的命运尚且朝不保夕，更何况遥远的昌州，不过是一个下都督府而已，事势难以逆料。至于张驹贤的隔代附和，更有鱼鲁帝虎之嫌。《旧唐书》记昌州设置时间为“乾元二年正月”，比诸家之说详细到月份，《唐会要》则具体到五月二十一日（759年6月20日）：“昌州，乾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分资、普二州置。”^③并非张驹贤说的“二年正月”，然则所谓“甚得事实”就要大打折扣了。王象之、张驹贤的“元年奏置，二年建州”论，意在回护乾元元年、乾元二年之间的时间差，为古今读者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而

已。

从数量上看，持乾元元年说的文献多达十数种，是乾元二年说的两倍，且绝大多数为官修志乘。从采信度看，首倡乾元二年说的《旧唐书》，成书于开运二年（945），距昌州初设已过188年，其时烽火连天，风雨飘摇，五代十国走马灯式更换，国库典册屡被回禄之灾，其文献依据何在？《唐会要》成书于建隆二年（961），时过境迁已204年，所记昌州置于乾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虽言之凿凿，却是一条孤证，自晚唐以下千余年间，仅此书言及具体的年月日，成为绝响。孤证不立，更不能轻易入史。中国史学自古及今都有“孤证不引”的传统，恰如郭沫若老先生所说：“孤证单行，难以置信。”^④如果这个时间准确无误，晚出各书为什么无一家援引？《新唐书》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晚于昌州初设303年；《舆地广记》成书于政和四至八年（1114—1118），最后定稿约在宣和年间（1119—1125），晚于昌州初设361—368年；《舆地纪胜》成书于宝庆三年（1227），嘉熙二年（1238）以后还陆续增补，晚于昌州初设470年至481年；《读史方舆纪要》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晚于昌州初设935年。这些书都属于后人追述，步《旧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昌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76页。

②张驹贤：《元和郡县图志考证》卷三十三《剑南道下》，《丛书集成初编》第3093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1页。

③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剑南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14页。

④郭沫若：《论古代社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8页。

唐书》之后尘，人云亦云，其事体莫须有。相对而言，首倡乾元元年说的《元和郡县图志》，由宰相李吉甫主持纂修，成书于元和八年（813），距昌州初设仅56年，属当代人记当时事，时隔不久的大臣奏章、六部批文、皇帝诏敕、往来公函、府库档案等都能亲睹亲闻，所记载的内容比数百年后的追述当然可信得多。且此书之编纂，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专为平定藩镇割据而作，“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①，事关军国大体，所涉人事时地，势必精审考证，不至信口雌黄。故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昌州及昌元县之初设时间，当以《元和郡县图志》乾元元年说为准，恰如《左传》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征”，不待龟蓍。

昌州自乾元元年勃兴，经大历四年迁徙，大历六年废弃，至大历十年重置，就像唐朝的国运一样，叠经坎坷。道光《重庆府志》记大历十年再建时，州治已迁至静南县，事不可考，不再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光启元年（885）或景福元年（892）昌州迁治大足县，昌元县已不再是附郭县（宋元两代称“倚郭”），也就意味着结束了昌州首县的历史，“昌元”之称从此名不副实。

五代十国时期，昌州先后为王建前蜀、孟知祥后蜀辖地。广政十七年（954），

昌元县治“为寇焚荡，移罗市镇”^②，在今荣昌区峰高镇境内。广政二十六年（963）升昌州为上州。

二、海棠香国

北宋乾德三年（965），宋朝灭后蜀，尽拥蜀中版图。至宋真宗时，陆续建置“川峡四路”，“四川”由此得名，昌州及其领县属梓州路（治今四川省三台县）。重和元年（1118），改梓州路为潼川府路，治潼川府（今三台县），昌州及其领县属焉。

宋代，昌州荣获“海棠香国”美誉。海棠是蔷薇科小乔木，全国各地多有栽植。但海棠花艳而无香，也不结果，唯独昌州海棠特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百花谱》最早披露：“海棠为花中神仙，色甚丽，但无香无实。西蜀昌州产者，有香有实，土人珍为佳果。”^③此语既出，历代文人竞相追捧。然昌州海棠名满天下，实与北宋音乐家彭渊材密不可分。彭渊材名几，又名攀龙，字渊材，又作“渊才”，以字行，筠州新昌县（今江西省宜丰县）人。或作“刘渊材”，因彭乘《墨客挥犀》径呼“吾叔渊材”，故以“彭渊材”为正。精通太乐，喜交游，性豪爽，出入京师贵戚十余年。平生有五大恨，“第一恨鲋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④。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首《序》，第2页。

②《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昌州·昌元县》，第4877页。

③程登吉：《幼学琼林》卷四《花木》注引贾耽《百花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07页。

④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一《迂阔多怪》，中华书局，2002年，第429页。

偶然得知“昌州海棠独香”，喜不自禁，心神向往。当时有位官员李舟，客居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日久，吏部终无差遣，一年后才授昌州太守，竟以离家太远推辞，宁愿改授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通判。彭渊材听说后，惊讶得为之“吐饭”，大踏步往见李舟，劈头责问：“昌，佳郡也，奈何弃之？”李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彭渊材如实相告：“天下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①闻者为之笑倒。

唐人惯以海棠状摹美女。宋真宗曾御制《后苑杂花十题》，以海棠为首章，赐近臣酬唱，刘筠等人皆步韵奉和。于是海棠诗风大盛，与牡丹抗衡而独步西州，尤以苏东坡那首“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②最脍炙人口。竭力推崇昌州海棠的彭渊材，所赋《海棠》诗也出语不凡：“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③以曹魏美男何晏食饼、唐代贵妃杨玉环出浴设喻，昌州海棠更加声誉鹊起。据说“海棠香国”这个雅号也是彭渊材取的，“渊才曰：海棠患无香，惟昌南者有香，故昌号‘海棠香国’……土人云：‘地宜此花，易植易蕃。’郡治香霏堂一老树，重趺叠萼，每花或

二十余叶，花气浓郁，余不能及也。”^④其实彭渊材并未明确使用“海棠香国”一词，据笔者考证，“海棠香国”美名，最早见于北宋沈立《海棠记·序》，庆历间沈立曾任益州判官，与彭渊材同时代而略早：“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海棠有色而无香，惟嘉州色香并胜，大足治中旧有香霏阁，号曰‘海棠香国’。”^⑤宋代嘉州治今四川省乐山市，庆元二年（1196）以宁宗藩邸升嘉定府，领龙游、洪雅、夹江、峨眉、犍为五县及丰远监，与昌州各是一地。据下句“大足治中”云云，显然“嘉州”系“昌州”之误，因为自唐末以来，历五代十国、两宋，大足县一直是昌州州治所在，与嘉州无关。

明代以降，昌州“海棠香国”的美称不脛而走遍天下，叶子奇、李贤、郎瑛、陈禹谟、陈耀文、周嘉胄、曹学佺、彭大翼、张岱等名士笔下，都是奇文幻出，史不绝书。

世谓海棠无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属昌州，而海棠独有香，故昌州号曰“海棠香国”。州治前有香霏阁，每花或二十余叶，香气浓郁。^⑥

入清以后渐趋式微，不过仍有余响，

①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九《昌州海棠独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②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校注》卷二十二《海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03页。

③彭乘：《墨客挥犀》卷十《作花诗用美女比其状》，中华书局，2002年，第395页。

④《舆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昌州·昌元县》，第4878页。

⑤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二百九十九《海棠部汇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7年，第67659—67660页。

⑥叶子奇：《草木子》卷一《观物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康熙时张英《文端集》、汪灏《广群芳谱》、陈元龙《格致镜原》等书中，“海棠香国”的美名尚不绝如缕。故荣昌西关外一里处，巍然耸立“海棠香国”碑一通^①，默默述说着古老的棠香遗韵，把永不消逝的唐风宋雅，洒向昌州大地。

从广义地域看，今荣昌、大足、永川一带均可泛称“海棠香国”。明末四川按察使曹学佺早就指出：“昌号‘海棠香国’……按即今之荣昌、大足、永川地也。”他还引述了“宣和太守张唐民”一首诗印证“海棠香国”的风土民俗：“无讼正如高隐地，隆冬方似早春天。州民富庶风光好，谁信无忧满二年？”^②张唐民，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人氏，北宋景祐元年（1034）甲戌科状元张唐卿胞弟。庆历二年（1042）应进士第，名落孙山，三月十九日（4月11日）欧阳修撰文送其东归，勉励他“艰而后通”^③。嘉祐四年（1059）任秘书丞，熙宁五年（1072）权提点成都刑狱，迁西川路转运使，熟悉蜀中风物。曹学佺引诗失题，“无忧”原作“常忧”，有一字异文。当是一首七律，颌联为“阴风

碧里鳞鳞瓦，落日红中缕缕烟”^④，尚缺首联，窥其诗意乃是描写“海棠香国”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地方富庶，人民守法，不啻世外桃源。

昌元县是昌州最早的附郭县，理所当然分享“海棠香国”的美名，而且有海棠堰、香霏阁等古迹，使得传说中的“海棠香国”既有精神皈依，更有物质载体：

“海棠堰，在废昌元县，当四道之交，乃井星中所产海棠，花色微黄，独有香，故以名堰，今无存。或云在吴家铺，县北一百二十里，堰有香霏阁，阁下有香霏桥，皆古名胜地……今堰犁为平田，求所谓堰与阁，渺不可得，而海棠都无香矣。”^⑤多种文献提及的香霏阁，是专供观赏海棠花的古建筑，“太守于郡前建香霏阁，每至花时延客赋赏”^⑥。名闻遐迩的“昌元八景”，其中“棠堰飘香”毫无争议地列在第一。乾隆时知县朱穀，教谕杨堂、赵城，同治时教谕谢金元，以及刘德嘉、朱钧直、敖时模、袁昂青等人都有诗歌题咏，蔚为大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晚清，海棠堰、香霏阁已荡然无存，棠香不再，仅于前辈翰

①文康、廖朝翼：《同治荣昌县志》卷十七《坊表志》附《碑表》，《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第5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5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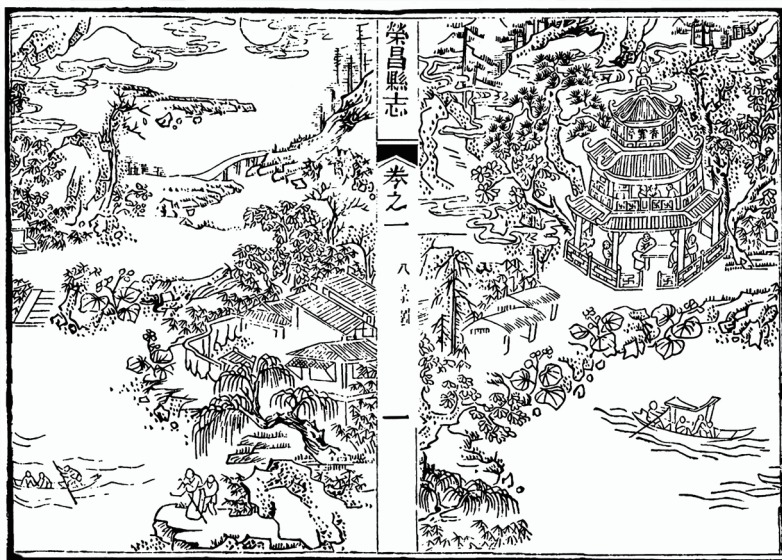
②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七《风俗记三·上下川东道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758页。

③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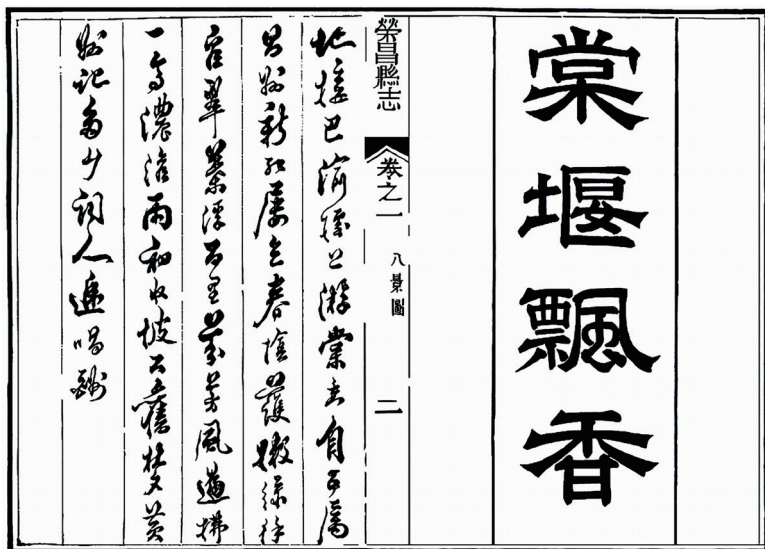
④《全宋诗》卷三百九十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59页。

⑤《同治荣昌县志》卷十七《古迹志》，第506页。

⑥汪灏：《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三十五《花谱·海棠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6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棠堰飘香（《同治荣昌县志》卷一《八景图》）



谢金元《棠堰飘香》诗（《同治荣昌县志》卷一《八景图》）

墨中，稍可追寻流风遗韵，供后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已。

是有了荣昌县的行政建制，治今地，正式确定了沿用至今的县名。

三、荣昌正名

元朝实行行省制度，至元二十七年（1290）撤昌州^①，所领昌元、永川、大足三县俱省入合州。

元末，红巾军领袖明玉珍于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363年1月16日）在重庆即皇帝位^②，国号大夏，纲纪法度，卓然有序。将元朝四川行省分为上川东道、上川西道、上川南道、上川北道、下川东道、下川西道、下川南道、下川北道八道。原昌元县地置昌宁县，治狮子坝，属上川南道。

明洪武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371年8月3日），中山侯汤和、德庆侯廖永忠率明朝大军攻抵重庆朝天门外，明昇投降，大夏灭亡。明朝迅速平定全川，于

①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21页。

②明玉珍称帝时间，《元史》卷四十六《顺帝纪九》作“[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杨学可《明氏实录》作“壬寅春三月戊辰”（1362年4月17日），《明太祖实录》卷十九作“壬寅春三月己酉”（1362年3月29日），兹从《元史》。

荣昌县的设置时间，明清史籍或语焉不详，或作洪武四年，或云洪武六年（1373）。景泰《寰宇通志》、天顺《大明一统志》笼统称“国朝改今县”“本朝改荣昌县”，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照录原文。康熙《大清一统志》模糊曰“洪武初改[昌元县]置荣昌县，属重庆府”^①，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大清一统志》一字不替。康熙《四川总志》亦闪烁其词，莫知究竟。

洪武四年说首见于雍正《四川通志》“洪武四年改[昌元县]置荣昌县，隶重庆府。”^②其后乾隆《荣昌县志》、道光《重庆府志》、同治《荣昌县志》、光绪《荣昌县志》只字未改。其文献依据皆源于万历《重庆府志》：“元末为明玉珍僭据，国朝洪武四年归附，置荣昌县，属重庆府，编户二十七里。”^③从语法和逻辑上看，这里的“洪武四年”，只修饰限定“归附”二字，是明朝灭大夏、县域归属的时间，并非荣昌县正式设置的时间。雍正《四川通志》不察，遂为乾隆以后各版《荣昌县志》、道光《重庆府志》递相援引，以讹传讹。

荣昌县的设置时间，官修《明史》最为精确：“荣昌，府西少南，洪武六年十二月置。”^④从此，“昌元县”成为历史概念，正式为“荣昌县”取代，迄今已有653年历史。从唐肃宗乾元元年到明太祖洪武六年底，昌元县运行长达615年。县域西北的原大夏昌宁县仍然存在，直到洪武七年（1374）才省入荣昌县。

关于县名的内涵，明末曹学佺解释说：“荣昌县，乾元间于此立昌州及昌元县，今名洪武四年改，介于荣州也。”^⑤这个释名非常牵强，纯属望文生义。昌州系割泸、普、渝、合、资、荣六州地设置，为何独以“介于荣州”命名？为何不以介于泸州、普州、渝州、合州、资州命名？早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曾任四川提学佥事的郭子章，梳理本县建置沿革时写道：“荣昌县，唐名昌元县，属昌州。宋因之。元改昌宁县。明改今名，仍昌州之义也。”^⑥同治《荣昌县志》也记载：“昌州，古郡名，徙昌元，改荣昌，均系以‘昌’字，其地则异，其名实同。”^⑦也就是说，“荣昌”县名的内涵，

①《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八《四川布政使司·重庆府·荣昌县》。

②黄廷桂、张晋生：《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建置沿革·重庆府·荣昌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③张文耀、邹廷彦：《万历重庆府志》卷二《沿革》，《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227页。

④张廷玉：《明史》卷四十三《地理志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1032页。

⑤《蜀中广记》卷五十三《蜀郡县古今通释三·重庆府·荣昌县》，第723页。

⑥郭子章：《郡县释名·四川郡县释名》卷上《重庆府·荣昌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7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9页。

⑦《同治荣昌县志》卷三《关隘志》，第315页。

乃是沿袭“昌州”初设时的本义。然自乾元元年以来，历唐、宋、元、明四朝，600多年间没有任何志书阐述过“昌州”命名的由来和寓意，故今日只能从字义上作些推断。

《说文解字》：“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诗》曰：‘东方昌也。’”^①引诗出自《诗经·齐风·鸡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亨传：“东方明，则夫人编笄而朝。朝已昌盛，则君听朝。”孔颖达疏：“言东方已明，道已可朝之节。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节。已以东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②又，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诗》曰：‘猗嗟扬兮，美目昌兮。’昌，美也……昌即明也，东方昌矣，即东方明矣。”^③徐锴是最早校定并全面阐释《说文解字》的训诂学家，《系传》世称“小徐本”，在中国训诂学史上至关重要。但此处引诗有误，《诗经·齐风·猗嗟》原文为“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尽管如此，总体上并不影响训“昌”为“美”，他的解释完全正确，符合许慎原著的本义。故段玉裁总结说：“盖昌之本义训美言，引申之为凡光盛之称，则亦有训为日光者，日光只为余

义。”^④综汇前贤论述，“昌”字有美言、光明、昌盛等含义，这大抵就是乾元元年李鼎祚请设昌州的初衷所在。

“荣”本指桐木，引申谓草木繁盛，开花结果。《尔雅·释草》：“华，芎也。华、芎，荣也。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⑤故“荣”字与“昌”字义通，可联用。

至于“荣昌”一词，早在元代就已出现。高文秀《刘玄德独赴襄阳会》楔子：“今有刘玄德因襄阳遭厄，跳檀溪失路迷途，误入鹿门山中。贫道今晚指引玄德荣昌之地。”^⑥明朝把“荣昌”用作县名，算是持之有据，名正言顺。民国吕式斌有言：“荣昌，本唐之昌元县，明灭元，改今名。”^⑦朱元璋建立明朝，并派徐达北伐中原，元顺帝北遁草原，元朝已然灭亡，明氏大夏政权才是朱元璋一统天下的最后障碍。所以他对出征四川的各路大军寄予厚望，特别是颍川侯傅友德出奇制胜，千里奔袭川西，逼近成都；廖永忠舁舟渡关，突破瞿塘天险，直捣重庆，令他颇感欣慰，特赋《平西蜀文》一章，又命诚意伯刘基撰《平西蜀颂》，“为傅将军、廖将军千万年不朽之功”大唱赞歌^⑧。君臣如此雄文，大张旗鼓歌咏同

①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三《日部》，中华书局，2018年，第1358页。

②孔颖达：《毛诗注疏》卷五《齐风·鸡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8页。

③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第1092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375页。

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七上，中华书局，2013年，第309页。

⑤邢昺：《尔雅注疏》卷八《释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0页。

⑥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94页。

⑦吕式斌：《今县释名》卷六《四川省·荣昌》，北平恒和商行，1931年。

⑧刘基：《诚意伯集》卷二十《御制平西蜀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469页。

一场战争，平蜀之战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了。以“荣昌”名县，既承袭当年昌州初设时的原始寓意，又符合“明灭元，改今名”的心理期许，对这个“朝既昌矣”的新县寄予美好的愿景。因此，把荣昌县名理解为“繁荣昌盛”之意，虽然缺乏直接的文献依据，然从语源学视阈考察亦大致不差。

荣昌县初设“编户二十七里”，万历《重庆府志》记载了其中二十六里：昌元里、昌宁里、新桥里、新兴里、高乔里、石桥里、古潭里、赖川里、赖通里、仁义里、人寿里、红岩里、虎岩里、安福里、安乐里、安贤里、从顺里、李子里、梧桐里、峰高里、罗会里、在市里、清滩里、换鹅里、白石里、沙溪里，失一里名，竟成永远的遗憾。隆庆元年（1567），清滩、换鹅、白石、沙溪四里割置隆昌县，荣昌县实有二十三里。全县设四镇，县北70里为昌元镇；县北100里为赖川镇；县北30里为古潭镇，明朝后期已废，仅存遗址；县东25里为罗会镇^①。

清承明制，康熙元年（1662）省大足县入荣昌县，雍正六年（1728）大足县重置，荣昌县恢复原辖区。嘉庆元年（1796）呈报户部人口数，共计33381户、成丁93598人，其中丁男48716人，丁女44882人。嘉庆七年（1802），荣昌县属川东道重庆府。

截止同治四年（1865），全县设东、南、西、北四乡，共一十二里。其中东乡辖罗会、峰高、安贤三里，有147甲，926村，丁男12617人，丁女9475人，小计22092人；南乡辖古桥、瓷窑、高桥三里，有121甲，796村，丁男12972人，丁女11919人，小计24891人；西乡辖昌元、昌明、仁义三里，有115甲，803村，丁男14982人，丁女12056人，小计27038人；北乡辖新兴、新桥、礼智三里，有109甲，806村，丁男9666人，丁女9027人，小计18693人。总计492甲，3331村，23994户，丁男50237人，丁女42477人，共92714人^②。

辛亥革命后，重庆革命党人策动重庆独立，于1911年11月22日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同盟会会员、荣昌人张培爵任都督。四川立宪派策动成都独立，于11月27日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912年1月27日，经双方全权代表张治祥、朱之洪在荣昌县安富镇“公同议决”，签订《协议合并草约》。3月11日，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在成都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正副都督，致电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报告成渝军政府正式合并，“全川统一”。民国二年（1913）宣布废除府、州行政建制，以道统县，荣昌县属川东道。民国三年（1914），

①《万历重庆府志》卷三《疆域》，第1册，第238页。

②《同治荣昌县志》卷四《户口志》，第322页。原作“共男妇九万二千七百一十二丁口”，是将东乡男女小计少算二人，致使全县总人口数亦相应误差二人。

川东道更名东川道，民国十七年（1928）裁撤，荣昌县直属四川省。

1949年12月7日，荣昌县解放，19日成立荣昌县人民政府，隶璧山专区（后更名江津专区、江津地区、永川地区）。1983年4月1日，撤销永川地区，所属荣昌等8县并入重庆市。1997年3月14日，重庆市直辖中央，荣昌县隶属重庆直辖市。2015年4月28日，《国务院关于同意重庆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正式批准撤销荣昌县，设立重庆市荣昌区。

截至2024年底，荣昌区辖昌元、昌州、广顺、安富、双河、峰高6个街道，

吴家、铜鼓、观胜、清流、仁义、河包、清江、万灵、盘龙、荣隆、龙集、远觉、古昌、直升、清升15个镇，共209个行政村、42个社区，区人民政府驻昌元街道迎宾大道26号。常住人口66.0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1.95万人，农村人口24.08万人。户籍总人口831032人，其中男性420598人，女性410434人，人口性别比为1.02^①。民族构成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族、土家族、苗族、壮族等40个少数民族4600余人^②。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伟

①重庆市荣昌区统计局：《2024年重庆市荣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网，2025年3月31日。

②王新莲：《区人大代表视察散居少数民族聚居点乡村振兴工作》，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网，2024年11月14日。

澳大利亚驻渝使馆见证的战时中国外交

刘婧雨

重庆渝中区的鹅岭公园内，一栋保存完好的中西合璧民国建筑静静伫立，这就是重庆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这座建筑不仅是抗战时期澳大利亚驻华外交机构所在地，见证了战时重庆的国际交往活动，更亲历了中国“重新确立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进程。

一、战时重庆：风云际会的中国外交舞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同年11月17日率领文官、主计、参军三处部分人员离开南京，西迁重庆，拉开了国民政府迁都的序幕。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宣言》，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各国驻华使领馆和外交机构也分批迁至重庆。回顾战时重庆的对外交往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抗战初期（1937—1940年），共有十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领馆和驻华机构。

1938年1月19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飞抵重庆，四天后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成为首位在重庆递交国书的外国使节。同年7月29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也抵达重庆递交国书。随着武汉会战结束，原驻武汉的外交人员纷纷西迁，至1938年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大使馆，以及比利时、荷兰公使馆人员均抵达重庆设立办公机构。

抗战中期（1941—1943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为战时同盟，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中日战争由此升级为两大阵营的全球性战争。1942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时期，驻渝外国使领馆达到13个。1941年，中国先后与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轴心国断交，同时加强与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关系。5月，中澳就互派外交使节达成共识。随后，中国又与加拿大、印度、埃及、伊朗和梵蒂冈建立

外交关系。至1942年末1943年初，驻渝外国使领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比利时五个大使馆，澳大利亚、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挪威、加拿大、土耳其、波兰、墨西哥八个公使馆，以及印度专员公署。

抗战后期及战后（1943—1946年），中国与同盟国的战时合作达到顶峰，重庆作为中国外交中心的地位更加凸显。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英分别签订新约，废除两国在华治外法权，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此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陆续与中国签订新约，取消在华特权。

为继续拖住日本兵力，阻止日本南进太平洋地区的步伐，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美国主导下，中国受邀参加了多个反法西斯同盟国际会议，如中、美、英、苏莫斯科会议和中、美、英开罗会议，商讨对日战略和战后国际秩序。这些重要外交活动均以重庆为中心策划实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外国在渝设立外交机构的数量达到抗战时期最高峰。秘鲁、伊朗、阿根廷、意大利、智利、巴西等13国在重庆新设大使馆；波兰、荷兰、挪威、墨西哥、土耳其、加拿大、捷克7国驻渝机构升格为大使馆。至1946年，共有22个国家在重庆派驻外交使团，这成为中国“重新确立在世

界上的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

二、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的前世今生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保存完好。这座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建筑始建于民国时期，占地269.72平方米，建筑面积539.44平方米。建筑造型独特，平面呈“凹”字形，室内房间沿中轴线对称分布。

1941年5月，中澳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同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登爵士抵达重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标志着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在重庆正式建立。重庆是澳大利亚第一个驻华外交使团的派遣地。当时澳大利亚仅在华盛顿和东京设有使领馆，中国是其派驻外交机构的第三个国家，重庆也因此成为澳大利亚在海外设立的第三个使领馆所在地。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是日军重点空袭目标。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公使馆最初选址于南岸瓦厂湾。^①该区域聚集



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

了包括美、英大使馆在内的多家外国使领馆，是战时外籍人士聚居区，日军对此区域的轰炸相对谨慎。然而此地距离政府机构所在地较远，加之汽油稀缺，往返市区还需渡江，极为不便。经过多方寻觅，1942年10月1日，澳大利亚公使馆与中央信托局签订租赁合同，正式租用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遗爱祠71号别墅作为馆舍。

战时重庆房屋紧缺，加之日军持续轰炸，城内大量建筑遭毁，公使馆部分房间也成为外交人员的生活居所。据公使秘书玛丽斯·金回忆，公使馆二楼被改建为生活区，公使、一等秘书和三秘居住于此，一楼则作为办公区。由于房间有限，她初到重庆时只能暂住附近宾馆——一座用竹架、泥巴和一点点水泥建成的简易房屋。^②1942年至1946年间，澳大利亚公使馆曾多次遭受轰炸，所幸

建筑结构坚固，未遭严重破坏。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迁回南京。次年4月，澳大利亚公使馆在新任驻华大使高伯兰带领下迁往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旧址所在区域改建为鹅岭公园，该建筑曾作为公园管理处办公用房。2003年3月，旧址被公布为渝中区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列入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作为同盟国驻重庆外交机构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升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保护修缮和陈列布展，如今的公使馆旧址已成为集主题展览、文创空间、休闲功能于一体的对外文化交流基地，既是彰显重庆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中澳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澳大利亚公使馆与战时中澳同盟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在重庆设立不久，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12月爆发，中澳结为战时同盟。自此，澳大利亚公使馆开始围绕维护中澳同盟关系展开工作。时任公使的艾格登率领馆员在战火纷飞的重庆与重庆人民并肩作战，及时向澳大利亚政府传递中国战况，确保澳方实时了解中国局势。

艾格登公使长期研究太平洋地区局势，是一位热心、体贴、周到的外交官，在重庆外交界备



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旧貌（1942—1946年间）

①周勇，刘婧雨，二战时期的中国重庆对外交往初步研究——以文本文献和影像文献互证的尝试[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

②白碧：《重庆公使馆——抗战时期澳大利亚驻华外交机构》，澳华历史博物馆，2015年，第20页。

受尊敬。任职期间，他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积极参与多场外交活动和盟军军事会议，向澳方传达中方立场，呼吁关注和支持中国抗战。他曾感叹：“我们对自身所在世界的了解如此贫瘠，令人无法想象，而且我们是在日本人打到家门口才意识到这一切。”在与墨尔本立宪俱乐部的讨论中，他指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抵抗战争，势必会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后重建上起到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澳大利亚必须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并找到合适的方法与其合作，共同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秩序”^①。

艾格登密切关注中国战局，积极推动国际援助。1943年4月，他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大公报》记者张季鸾一同考察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生产项目。他还向澳大利亚内阁建议派遣农业代表团援助中国，并指派公使馆外交官基司·欧菲斯和三秘李贵方考察中国西北地区各行业发展。英国记者君特斯坦在专访中写道“他真诚地相信澳大利亚必须越来越多地与中国合作”^②。

公使馆人员高度关注重庆遭受的野蛮轰炸。一秘吉斯·瓦勒在回忆录中痛惜地写道，战争给重庆带来巨大破坏，“重庆曾经的城墙、庙宇、宫殿现在都

没了”^③。1941年7月，《堪培拉时报》报道了西方驻华外交官的生活困境：“在中国的战时陪都，要找到一处适合作为公使馆的建筑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军轰炸严重毁坏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英国大使馆也已成废墟。在那片未被轰炸的地区，生活设施几乎无处可寻”^④。容纳大部分西方记者的新闻宾馆在这一年遭遇了数次轰炸，重建后的宾馆只是“用泥砌出来的矮墙，茅草搭建屋棚，就像是一座摆错位置了的非洲牛栏”^⑤，与重庆其他重建房屋别无二致。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公使馆人员对中国抗战事业充满信心。外交官基司·欧菲斯坚定表示，“按照日军侵占的速度，重庆有可能被侵袭，届时国民政府可能会因此考虑再次迁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的职责是国民政府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⑥。

作为澳大利亚驻重庆代表，艾格登公使及其继任者高伯兰都曾拜会旅居重庆的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公使馆密码员兼内务负责人艾丽森·瓦勒与周恩来的助手龚澎结为好友，两人会面时，龚澎都请她向公使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1944年，艾格登离开重庆出任驻美大使，由公使馆一等秘书吉斯·瓦勒暂

① William Sima, China & ANU: Diplomats, Adventurers, Scholars Canberra: ANU Press, 2015. p.51.

② Eggleston's Job in Chungking, Newcastle Sun, March 18, 1944.

③ Keith Waller, A Diplomatic Life: some Memories, Nathan, Queensland: Griffith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Asian Relations, 1990.

④ 白碧：《重庆公使馆——抗战时期澳大利亚驻华外交机构》，澳华历史博物馆，2015年，第15页。

⑤ Leland Stowe, They Shall Not Sleep, New York: A.A. Knopf, 1944. p.29.

⑥ 白碧：《重庆公使馆——抗战时期澳大利亚驻华外交机构》，澳华历史博物馆，2015年，第39页。

代馆务。1946年3月，高伯兰接任驻华公使。重庆澳大利亚公使馆由此成为抗战时期中澳两国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四、公使馆见证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①

1942年6月，盟军在中途岛战役获胜，战局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转变。美英两国一致认为向中国提出废约的时机已经成熟。随后四个月间，英美就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多次磋商。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中美平等新约》，同日宋子文与英国大使薛穆在重庆签署《中英平等新约》，美英放弃在华一切特权。澳大利亚作为中国战时西方盟友之一，于1942年介入废约谈判。作为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的域外权利随《中英平等新约》签订而自动失效。此后，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九国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类似条约。至此，延续百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彻底打破，中国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大家庭。这一战时中国的重要外交成就，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新时代的曙光”^②。

战时中国彻底废除外国在华治外法权，取得与其他盟国的平等地位。澳大利亚驻华公使馆外交官参与了中澳废约谈判，推动并亲历了中国战时外交走向

平等的历史进程。中国与盟国间平等地位的实现，不仅巩固了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协同作战，也极大鼓舞了中国抗战士气。这一事件既是扭转亚太战局的重要转折点，也成为影响亚太政治格局、为反法西斯战争赢得更广泛国际支持以及中国跻身“四强”大国的关键里程碑，为同盟国最终胜利起到激励和促进作用。因此，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不仅是中国现代外交黎明的见证者，也是重庆开放历史文化资源与开放文化精神的展示窗口。这类涉外旧址既是重庆与国际社会交往合作的历史基石，也是展现当代重庆开放包容城市形象、推进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总之，深入挖掘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的历史价值，让更多涉外旧址成为重庆对外交往的展示窗口，持续发挥其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既是坚定文化自信、创造新时代文化、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华章的应有之义，也是重庆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

责任编辑：周怡彤

①周勇，[荷]张克雷，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重庆出版社，2017年。

②New Day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3, 1943, p.22.

档案方志为钥

——解锁一名江津籍抗战川军的乱世生平

匡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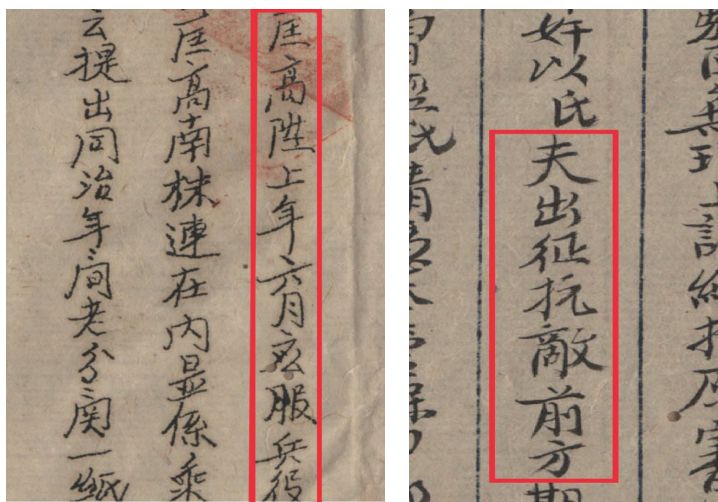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江津曾持续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力、财力和物力。据《江津县志》（1995 年版）记载：因抗日战争爆发，自 1937 年 10 月起，江津全县每月征兵 100 人；后由于战情趋紧，自 1939 年开始，月征兵数增至 513 人；1937 年至 1945 年间，江津全县累计征兵达 42852 人。无数江津子弟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其中，一位名叫匡高升的士兵，若非一份民国司法档案中留下的线索，他的姓名与事迹或许至今仍不为族人所知。

一、续修族谱寻根，司法档案现曙光

江津区吴滩镇的匡氏家族，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至今已在江津繁衍生息三百余年。近年来，匡氏后人着手续修族谱，多方搜集先人资料。然而岁月流转，许多前辈信息已无

从考证，笔者的堂曾祖父一脉便是其中之一。按照传统宗族观念，堂曾祖父与笔者尚未出五服，血缘关系较近，但不知何故，旧族谱中并未记载他们一房的任何信息，成为修谱过程中的一大遗憾。

在查询曾祖父相关档案时，笔者于江津区档案馆所藏的一卷民国民事司法案宗中发现，1941 年曾祖父曾协助一位名为匡罗氏的女性处理诉讼。匡罗氏因房产纠纷涉讼，案卷载明其丈夫名为匡高升，于 1940 年 6 月“出征抗敌”，应



匡高升的档案资料

征时间与《江津县志》所载出川抗战时段基本吻合。

二、档案抽丝剥茧，族谱残痕印证

然而查阅现存族谱，并未发现匡高升之名。继续研读卷宗，发现其父名为匡在洋，又名焕林，与族谱中“在”字辈“焕林，失考”的记录恰好对应。由此确认，匡高升正是那位在族谱中失载的堂曾祖父。

通过进一步查阅档案，我们得以提取更多信息：1941年，匡罗氏34岁，与匡高升育有一子匡学海。学海曾在一张法院传票上代母签收，笔迹稚嫩，推测其当时年约十岁。案卷还提及，匡高升出征五个月后，匡罗氏产下一名幼子，不幸早夭。九年之后，另一份司法文书记载，匡罗氏仍未等到丈夫归来，迫于生计，与家中前长工余某重组家庭。

综合地方志与民国档案，这位普通士兵的生平轮廓逐渐清晰：1940年6月，全国抗战形势严峻，江津每月有五百余名男儿奔赴前线，匡高升就在其中。他离家之际，妻子身边已有十岁上下的长子，并再度怀有身孕。然而军情紧急，他毅然出征，从此再未归来，甚至未能见过幼子一面。一年后，因家中缺少男丁，匡罗氏母子房产遭人侵占，陷入诉讼。幸得族人匡高南、匡青云相助，方得安身。九年后，为在乱世中求生，匡罗氏携子改嫁，但在诉讼文书中仍署名“匡罗氏”，其本名已不可考。匡高升自“出征抗敌”

后音讯全无，极有可能在战场上捐躯。其子随母改嫁余家，与匡氏族人往来甚少，而曾与匡高升家关系密切的匡高南、匡青云又先后迁离吴滩。随着老一辈逐渐离世，匡高升一家的事迹渐被遗忘，以致族谱中难觅其脉踪迹。

三、档案方志价值彰显，守护民族记忆根系

匡高升故事的再现，生动诠释了档案与地方志的存史价值。江津区档案馆完整保存了自民国元年起的24000余卷民国司法档案，是全国保存民国司法档案最为完整、数量最多的档案馆之一。若无司法档案中“夫出征抗敌”等关键记载和《江津县志》对征兵背景的系统记录，匡高升或许永远只是族谱中“失考”二字，湮没于历史洪流。

这些看似朴素的史料，以其严谨与真实，留存了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填补了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体空白，使“全民族抗战”成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故事，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真切触摸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档案与地方志，是民族的“记忆锚点”，连接着我们与过去的血脉。保护好这些文献，就是守护民族记忆的根本，让每一个平凡的人生，都不被岁月遗忘。

（作者单位：江津区地方志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周怡彤

家乡的几件“宝物”

樊家勤

我的家乡在长寿区果园村（有段时间叫“幸福花大队”，后合并），我居住在当时的8生产队下樊家湾。我的住地有几件“宝物”。什么“宝物”呢？听我慢慢道来。

几个蛮洞

我家住房背后一百多米远的西面有一个叫大石堡的地方。这里薄薄的土层下面全是整块整块的石堡，延伸很远，有的根本就没有土，石堡直接露在外面，在那附近住的人家就在石堡上晒粮食。

晒粮食这块石堡很大，除了裸露的外，其他的被田土覆盖着。从这块石堡往下走，需要经过在石堡上鑿出来的石梯，比较陡，人称高坎子。走在那石梯上，如平视前方，感觉自己站得很高，远处很低，近一点的是一道深沟，眼前的土坡、弯曲的道路显得也很低，还有些小。有些胆颤，害怕摔下去了。

下了石梯往右看，是一块庄稼地，呈长条形。长约五六十米，宽约三四米。这块庄稼地的后面就是那块大石堡露出来的岩石，岩石上有洞子。第一个洞子

就在高坎子旁边，洞子前面有一些比较小的乱石，上面长满了青苔。洞子最外面三面洞框是用鑿子鑿的，约七八寸宽，上面还有鑿的条痕，一层一层往里面梯形延伸，大约有三层，越往里面延伸，洞口就比外面小一层。

走进洞子，里面呈正方形，一人多高，可容纳十多二十人站立。一人站在里面显得空荡荡的，感觉好像被什么保护起来似的。顶部和周围都有很多鑿子形成的条路。要是在里面吼叫，还有回声。小时候，我曾和队里的小伙伴在里面捉过迷藏。

从第一个洞子出来往北面走，看到还有几个相同的洞子，共有四五个。每个洞子的形状、大小都是一样的。开始看到的那个洞子是干燥的，也很干净，越往北走的洞子门外就越有滴水，水从上面的石堡渗下来显得湿漉漉的，而且有苔藓，感觉有些脏，小孩一般不进去玩。

据大人讲，这几个洞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发挥了作用。日本飞机飞来时，大人带着小孩就跑进洞里，躲避轰炸，保下了性命，但住得稍微远一点的就沒有这样幸运。

我的一个幺婆，住在距离几百米外的杨家湾，那里没有洞，日机飞来时没有躲得赢，就在湾子里遭遇到炸弹，把腰部炸伤了，终身成驼背，走起路来像可怜的骆驼，耳朵也炸聋了，她每次说话就是很大的声音。

有一年，生产队把有的洞口封了，用来储存氨水，到时给庄稼施肥。氨水容易挥发，而且很刺鼻子，要是接近只能有闭一口气的时间，要想换气是很难的，不然会出大事。听说有社员担着粪桶到长江边上去担氨水，这氨水是从泸州用船运来的。由于船的边缘有些滑，加上闭气的时间很有限，有些紧张，便掉进了装氨水的船里，结束了生命。氨水密封在这整块石头形成的洞子里就不容易挥发，也安全。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对那洞就会产生感激之情。

对于这些洞子的形成，我小时候并不知道，长大后，渐渐有所了解。知道这叫蛮洞，有几种说法，有说是蛮子住的，有说是防止土匪的，有说是张献忠攻打四川时用的。

在我所见到和了解到一排有四五个完整无缺的蛮洞，有些罕见，应该有一定的价值。我曾在万州大瀑布附近看到一个类似的蛮洞，在旅游路标上向游客做出了指示。现在有些地方把当地的蛮洞作为保护单位了。我想，我家乡的那几个完好的蛮洞也能被保护起来吧，但让人很遗憾。

在二十一世纪初，那里搞大开发，

听说是“巴斯夫”要来建培训学校，那几个蛮洞在震耳欲聋的放炮声中、在轰轰隆隆的推土机下被毁了。在这之前，我曾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要求保护那几个蛮洞，可惜还是以遗憾而告终。大石堡那一片立起了栋栋楼房，但培训学校不见踪影。在那附近还出现了别墅房的水泥框架，多年完不到工，显得有些荒凉而悲哀。

石箱子里面藏着宝

就在那些蛮洞的前面，也就是那块长条形的庄稼地外面，有一块像馒头形状的石头，它像一口箱子搁在那里，湾子里的人就叫它石箱子。这口石箱子看起来有两层，上面那一层石头就是箱子的盖子，下面一层是装宝物的箱框，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有一条缝，很明显，好像能打开，但那盖子把箱框盖得严严的，似乎不准任何人来打开。

我从小对这口石箱子就很着迷，好奇地问妈妈，那里面有什么？妈妈好像带着夙愿说得很认真：装的金银首饰和新衣服。我反问：那怎么不把石箱子打开，把新衣服拿出穿呢。妈妈说：不能打开，那石箱子是保护我们湾子里人的。

我不说话了，但对那石箱子越是充满好奇和爱意。有时候，我放牛到那石箱子外面荒地的底部，总要很认真地看看那石箱子，感觉好高好大，如果要去，外面这一面是爬不上去的，只能从那块

长条形的土地处爬。石箱子和地面接触的那些地方，有些干燥，终日淋不到雨，显出淡红淡红的颜色，地上还可看到有粉末物飘落在那里，光秃秃的，没有长草。我骑在牛背上，想象着石箱子里面那些金灿灿的宝物，想象着那里面一件件的新衣服，要是拿出来穿多好啊。那个时候，能有新衣穿是多么大的奢望啊！

有一次，我从长条形的土地那边爬上石箱子顶部，感觉自己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离地面很高很高，也很开阔，远看，人似乎在晃动，虽然有些胆怯，担心从石箱子的背上滑下去，但我还是极力稳住自己，看着那青色的犹如乌龟背的石箱子盖子，看到欢快的鸟儿飞来歇脚，叽叽喳喳地叫，有时还把屁股微动，拉出屎来，留在那石箱子的背上。我想象着这里面藏着宝物的形状、颜色、数量，好奇又无赖。我不敢在上面久留，要是没有爬稳滑下去了就麻烦了。没有要多久，我就从石箱子的背上谨慎地梭下去了。

还有一次，我在石箱子的背上居然看到一棵黄葛树的幼苗，那幼苗的叶子嫩绿嫩绿的，大而饱满，很茁壮。我想在这光秃秃的石头上面再好的树苗也长不大，成不了材。使我吃惊的是，几年后，那棵黄葛树居然长得枝叶繁茂，树叶深蓝、厚实，在微风中欢快地摇曳着，树干也粗壮，颜色鲜嫩翻白，上面还有裂纹，那些如虬枝一般的须根像一只只爪爪，紧紧地依附在石背上，更有甚者已

经钻到石箱子那条缝里面去了。我看过一些在石头上长的树，不是很纤细、树叶没生机，就是像个老疙瘩，长不高长不大。我还看过六盘水养生谷的那棵“石生树”，不高，也不鲜活，还有些枯萎，与石箱子上那棵黄葛树形成鲜明的反差。我对这棵黄葛树充满好感，希望它能长成参天大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口石箱子的命运好像走到尽头了。在20世纪70年代，幸福花大队要在一个叫鹅子沟的地方修建水库，搞农业基本建设。水库泥土大坝下面埋着的水渠需要条石，外面引流的水渠也需要条石。这个水库是被当地人称为土专家、我的父亲樊叔达设计修建的。父亲之前还在鹅子沟上面一段的山沟作技术指导，修建石河堰，差点丢掉性命。那石河堰的拦河坝全是用石头，没有泥土，当时没有用那石箱子的石头，用的多是从附近坟墓里挖出来的墓石。拦河坝修好后，要是走在坝顶上往下看，伴随着哗哗的流水，脚都要打闪闪。

后来，修鹅子沟水库时，那种墓石难找了，大队干部找来找去，就想到了那口石箱子，但石箱子离鹅子沟水库还有好几里远的路程。为了解决搬运问题，队里动员社员在沿途开挖、夯实泥槽，泥槽做好后，就找来木料做成小“木船”，运输石材。

一段时间，石箱子周围热闹非凡，鑿子声、号子声、大锤与楔子碰撞时发

出的“哐当”声不绝于耳，传出很远很远，成了一个开石的石场。石箱子被打开了，出现在那地上的是一条条的条石。一些汉子把长方形的条石抬去放在那附近泥槽里的“木船”上，年富力强的男人们在“木船”前部的铁钩上套上绳子，再在泥槽里浇上水，借着水的润滑作用，把“木船”拉起走，一条木船可以拉好几条条石。一路上号子吼得满天响，有点像纤夫。遇到下坡处还可以放“飞鸽”，不过得小心，不然可能会伤到人，会出人命。休息时，大家围着“木船”擦汗水，抽烟，谈理想，谈人生，谈鹅子沟水库的未来，幻想着幸福花大队变成了幸福花街道，乐呵呵的。这样，一直搞了很久，石箱子的石头才被开发完，被拉完。

我梦寐以求的好东西，直到石箱子全部开采完也没有看到，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妈妈说了谎，或者是教育我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需要诚实劳动才能有美好的幸福生活。

那修好的水库的水通过石头修建的水渠源源不断地循环地灌溉着家乡那肥沃的田土，看到那茁壮成长的庄稼在微风中摇摆着微笑着，看到坝子里晒着那金灿灿的稻谷、玉米等农作物，我暗暗地高兴了，原来，那石箱子的金银财宝、新衣服在这些地方出现了。

特殊的木碑

在离我住家不远的7生产队的上樊

家湾，听说那里的一栋房屋内有一壁木板很特殊。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事后觉得有点意思，便抽了个时间从城里回去，找到家人带路专门去探个究竟。

来到那湾子的坝子前，看到坝子的石缝处杂草茂密，没有一个人，显得冷冷清清，坝子旁边堆了一些秸秆、柴火等杂物，正前方的房子烂朽朽、要倒要倒的。我产生了怀疑：这么破烂的地方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東西，但我还是怀着探究的心情既小心又大胆地向前方的房屋内走去。

我想起来了，这里是樊家祠堂，小时候，父亲带我来过，当时还有围墙，虽不气派，但显得很清爽、干练、朴实。围墙中间是一道大门，进去就是现在这个坝子，我在坝子和小朋友玩，父亲就进到里面去了，可能是参加什么活动吧。

进了一道门，我小心翼翼地踩着地下的干柴，时而还向上望望，生怕上面的木料、青瓦突然掉下来砸着我。来到一个天井处，这里杂草青青，预示着不管是鲜花盛开，还是荆棘丛生，生命都会顽强地生长、延续，带来希望，带来美好。

再进一道门，来到正堂。这里的光线比较暗淡，我用手机打开电筒照着，四周放着箩筐、背篋、木板凳、编织袋、锄头，到处是蜘蛛网，唯一有现代味的是墙壁上挂着的那口时钟，也不知走没走。看得出来，这是一栋穿斗结构的房屋，在外面看起来已经摇摇欲坠，但里面那粗大的木柱子还很扎实，桷壁也还将就，

在顶部的筑壁黢黑但光滑，似乎在述说着时间的久远，特别是右边木柱子中间有一壁木板比较醒目。木板已经被以前的烟雾熏得比腊肉还黑，像刚从煤窑出来的挖煤人一样黑，但可能就是被烟熏了的原因，木板完好无损，上面的文字还能辨认：

具正堂，何示：文良、文成以忿诬重搯，具控文海、文潮同侄德普，诬控在案。文海等以透毁灭霸稟卷词称：仕立公清明会有红契约一张、当约二张、捨约一张……永垂久远，世代绵绵矣。

落款是光绪二十八年。

文字的大意是一个大家庭里出现一方诬告另一方，搞得很大，最后闹到当时的县令那里去了。县令了解详情后讯断批明：既然各约是文良遗失，且有档案可查，飭令遵照办理，即了案立碑。对此，双方遵断了息，重归于好。为了

教育后人，特将此事刻于祠堂正厅右壁木板上，随时提醒家族成员记住这件事，美好的家德家风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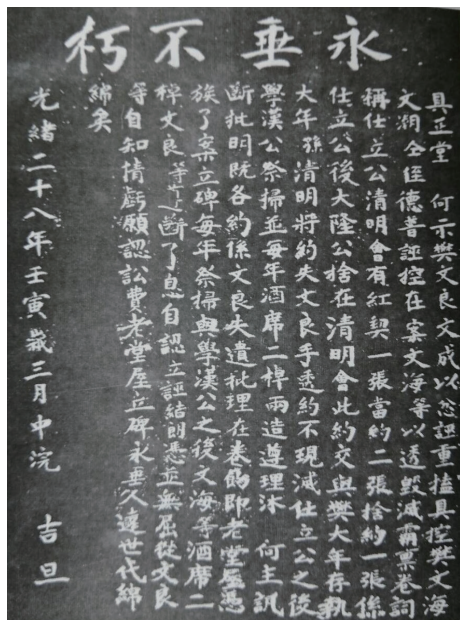
这个刻着字的木碑究竟有没有意义？我拿不准。看来，我还得请专家。于是，我便吸取前次的经验，向懂行的区文管所积极认真的反映，文管所很重视，尽快派工作人员赵老师来查看了那壁木碑，并进行了简单访问、拍照记录，后无音讯。

多天后，我向文管所打听此事，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回答了我的提问，并说那当然是文物，可以作为湖广填四川的实物。听到这话，我只是有丝丝的慰藉。想到那壁木板，想到那岌岌可危的房屋（应该属于清朝时期的建筑），它们还能存在多久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采取措施，做好保护。令人痛心的是，2024年上半年，那里搞开发，上樊家湾的房屋要撤除。在撤除该房屋前，家乡的晚辈樊兴春给我来电话说了此事，我急忙给长寿区文管所（博物馆）报告此事，他们准备派人来撤下木碑带到博物馆保存，本想原地不动，现在看来不行了，那木碑要“搬家”了。很遗憾的是，就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那天的早晨，发现那木碑被盗了，现场还留有钢钎。

我家乡的三件“宝物”，在风风雨雨中，已经消失了，那特殊的木碑虽然有照片，但也不是实物了，真可惜啊！

（作者单位：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

责任编辑：张莉



樊家祠堂筑壁处的刻字木牌拓片

渔村上长出的城市

文 猛

看着一座城市在一方渔村长出来，我们都赶上啦！

渔村叫陈家坝，身边是奔流的长江，对面是古老的江城万县市。渔村有两座古老的砖石塔——翠屏双塔。翠屏山顶叫文峰塔，翠屏山脚叫洄澜塔，那是古万州十景“秋屏列画”的点睛之笔。我师范同学何大江家在洄澜塔下，他家祖祖辈辈打渔。1983年9月同学何大江考入万县师范学校，他父亲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是叹息“何家的船桨传不下去啦！”……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1983年9月我们相会于水杉林中的万县师范学校，何

大江就一直在唱这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飞扬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何大江。我告诉他，这首歌是乔羽先生写给大运河的，不是写给长江的。何大江理直气壮地说这首歌是唱给所有江河的——渔村陈家坝就在何大江语言讲述的河流之上徐徐展现在我们脑海之中。

1986年春天，我们相约去同学何大江的老家陈家坝，马上就要毕业天各一方，这是最后的机会，这是何大江再也无法拒绝的季节。我们三个男同学邀请了三个女同学，没有其他过多的心思，我们都是朗诵兴趣小组的。

那个年代的江城万县江上没有大桥，走过长江到陈家坝的上游和下游必须得乘坐轮渡。城里有两个轮渡码头，一个



江南新城

在沙嘴河坝，一个在钟鼓楼。我们在钟鼓楼等待轮渡船。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遥望对面江南的陈家坝，白茫茫的一片，像是下了一场春雪。过江的人很多，过江的船很多，看梨花的，画画的，放风筝的，搞野炊的，采摘新鲜蔬菜的，到渔船上买长江鱼的。何大江说，江城万县是陈家坝喂大的。

走下轮渡船，码头高处就是洄澜塔。何大江带着我们找他家的渔船。何大江说岸上站着买鱼的人最多的地方的江上就停泊着他家渔船。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是渔村有名的桡胡子。桡胡子是川江上对打渔人的称呼。古时川江人挖空树干做成独木舟，靠划“桡”来行船，胡子是川江对男人的别称。何大江家的渔船，早已不是独木舟，是一艘机动船，船上早没有了我们想象中的白帆。何大江父亲看见儿子回家，大声对围着买鱼的人喊：“今天的鱼不卖啦！我家大学生回来啦！”

中午自然在船上吃鱼，喝着高粱酒，吃着长江鱼，吹着江风，江鸥翻飞，汽笛声声，江上除了打渔船、货船，最多的就是客轮，“江渝”“江汉”“东方红”“川东”“东方之星”，这是川江客轮运输最红火的年代，每一家航运公司都有几十条客轮在上海、武汉、宜昌和重庆之间奔忙。

遥望对岸的江城，江城的封面是西山钟楼，高高矗立在长江高处，看见西山钟楼，大家都知道万县到啦。一条条

马路依山而上，面对奔流的长江感觉长江就像一个巨大的运动场，不知是江城在看陈家坝，还是陈家坝在看江城？

穿过一片片菜地，穿过一片片梨园，空气中弥漫着菜香、梨花香、橘花香，我们来到翠屏山麓的岑公洞。相传是隋末江陵人岑道愿为避乱在此隐居修道而得名。自晚唐以来，岑公洞名声日盛，逐渐成为长江沿线的名胜。关于岑公洞，《方輿胜览》中有过明确记载：“岑公岩在大江之南，广六十余丈，深四十丈，石岩盘结若华盖。左右方地有泉涌出，岩檐遇盛夏注如松篁，藤萝蓊蔚葱翠，真神仙窟。”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洪咨夔等几十个诗人、文学家都给岑公洞留下诗文和墨宝。难怪陈家坝人说1800年前三国蜀汉南浦（万县市最早的名字之一）曾置县于江南陈家坝腹地。是先有江北的江城万县，还是先有江南的陈家坝？这是江南江北一直争议的话题。

我们在洞口大声诵读陆游的《游岑公洞》：

大业征辽发闽左，军兴书檄煎膏火。
此时也复有闲人，自引岩泉拾山果。
后六百年吾来游，洞中正夏凄如秋。
乳石床平可坐卧，水作珠帘月作钩。
十年神游八极表，浮名坐觉秋豪小。
试问岑公迎我不，鹤飞忽下青松杪。

诵读陆游的诗句，对于眼前神奇的岑公洞，我们不敢再有文字。

夜幕降临，梨园中、红橘园中、菜

园中的城里人陆续坐着轮渡回到江城。我们来到洄澜塔下何大江的家，何大江的爷爷在修补渔网。爷爷告诉我们，陈家坝一路顺江而下，就有晒网坝、大河坝、塘角三个渔村，早些年一条渔船就是全部家当，后来江北城市变大啦，很多渔民上岸开始为城里人种菜种粮，才陆续在岸上修了房子。

仰望高高的洄澜塔，遥望对岸的江城，街灯次第亮起，城在江中，江映江城。“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烁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闪烁着无数的街灯……”感觉诗人郭沫若的诗句就是写的这方江城。

何大江的父亲回来了，他和爷爷喝了几碗高粱酒，开始唱起川江号子。何大江说酒是桡胡子的命，没有酒就没有了魂。

“大河塘角打鱼虾，晚上夜泊晒网坝。一背太阳一背雨，风里浪里就是家……”

1986年8月，我们这群“中师生”如一粒粒种子撒向远远近近的山村山学。何大江并没有分配到陈家坝，尽管这也是一个村庄，去了七耀山下一个山村小学。我分回了我的家乡一所新办的初中学校。我们远离了这方城、这条江、这方美丽的渔村。

江城在长大，渔村在改版。

2003年1月，我从乡村中学转行到了财政局工作。因为重庆直辖，这座叫“万县市”的城市改名叫“万州区”，

成为远离重庆市314公里的第二大城市。因为高峡平湖，江城的一马路、二马路、环城路、胜利路都沉入了茫茫的平湖，长江从一条江到一汪湖，江湖之变，城市水涨城高。新的城市扩展到了周家坝、龙都、双河口。长江大桥的修通，城市扩展到五桥、百安坝。尽管如此，万州人不得不承认现实，城市太挤啦，城市必须过江。

站在高笋塘广场遥望对面的江南陈家坝，长江上修通了长江二桥，往来穿梭上千年的轮渡成为了历史，人和车不再踏波到陈家坝，踏桥过陈家坝，就像从城市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一样便捷。人可以踏桥过江，城市自然可以踏桥过



一桥连江南江北

江，曾经生长庄稼、生长蔬菜、生长渔歌的三十里渔村，从 2003 年 1 月开始生长一座三十里陈家坝新城。

如果说陈家坝第一粒城市的种子是 1800 年前的三国蜀汉南浦县衙。1800 年后新的第一粒城市种子应该是陈家坝行政中心，三幢巍峨高大的行政中心大楼在翠屏山脚拔地而起，一坡石梯连通大江，那是太阳最先照到的地方。区委、区政府搬迁行政中心，展示出万州人建设陈家坝新城的决心，也坚定了全国各地投资商入驻陈家坝新城的信心。他们像承包菜园一样在曾经的菜地上种出一片一片叫南山绿庭、滨江一号、长江之星、江城一品等楼盘，让江城人枕梦陈家坝。医院、银行、学校、商场、邮政、酒店赶趟儿似地走向陈家坝建设分部甚至搬迁总部。那时我在高笋塘工作，遥望陈家坝，总感觉天地之间有一支马良手中的神笔，我从没有见过一座城市如此茁壮的长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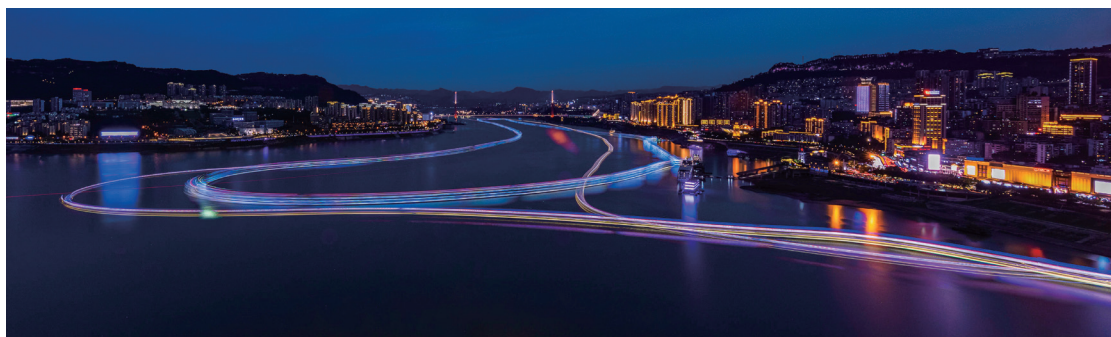
从沱口湾到樱花渡，一路绿荫叠翠，古韵流香，淹没在江波之下的万州古城墙、岑公洞飞瀑、万州到利川、万州到

云阳的古道原样复制，迁移到这方陈家坝人称为南滨路上段的地方。

长江三桥南桥头是樱花渡生态智慧体育公园，4000 多棵 60 多个品种的樱花，层次分明地再现出昔日的渡口景观，成为远远近近的人到万州看湖听水必须打卡的地方。

从樱花渡到白鹭湾，是陈家坝最繁华的地段，风格各异的高楼大厦从江边次第叠加到翠屏山、南山脚下。长江之星，驿鑫商业街，南滨公园，翠屏山公园，巴文化广场，世界大河歌会舞台，三峡移民纪念馆，三峡艺术产业园，三峡大剧院，以平湖为背景，以江空翻飞的天鹅、白鹭、白鹤、野鸭为背景，成为万州新的城市封面。短短 20 多年时光，30 里陈家坝长出了很多很多的高楼，八大广场、十大公园和沿江 10 里美食街道，好像陈家坝千百年来就在等着摆放它们，一点没有对岸老城的拥挤，江是清的，风是清的，山上一弯月，山下一江水，山中一林鸟，山坡一方城。

三步两步是公园，三步两步是鲜花，三步两步是美食，在陈家坝，你无法克



夜色中的江城

制见异思迁——路的前方，总有更美的公园，总有更艳的鲜花，总有更奇的美食，流连忘返是陈家坝永远的心态。在陈家坝，放牧诗句，放牧思想，那是阳光的暗示：毡帽山上雄鹰飞过，那是写给天空的诗；晒网坝渔歌绕梁，那是写给渔村的诗；密溪沟小桥流水，那是写给乡愁的诗；滨江路千帆竞发，那是写给远方的诗……

我同学何大江洄澜塔下的老家只给他留下一张照片，那里建起了几十幢高楼，电报路小学江南校区建在楼盘之中，学校的校门正是他家当年老屋的地方。学校很想把何大江调回学校任教，何大江说他走了，七曜山下那些山里孩子怎么办，答应再过几年退休后回到学校当一个门卫，给孩子们讲昨天的渔村，讲大山的故事。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后，何大江的父亲和村里的渔民把自家的渔船改为清漂船，加入到三峡清漂船的队伍，过去他们在水下打鱼，今天他们在水上清漂，渔村改版，他们改行，大家都赶上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任职的单位还在高笋塘，我在陈家坝最高的地方一处叫南山绿庭的小区买了一套房子，推开窗户看不到长江，走上屋后的翠屏山公园可以看到江对面的江城和大部分的陈家坝新城。江南江北长大的城市环抱着一汪平湖，平湖成为万州人最大的客厅，我喜欢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长江上的五座大桥好像也

是长出来的，江上的轮渡早已停运，长江上除了豪华的三峡游轮，没有了曾经繁忙的客船。江上船很多，除了清漂船，最多的就是“滚装船”和万吨巨轮，长江上永远那么忙。2021年因为维护长江二桥封桥，为方便两岸群众往来，江上再次开通轮渡，尽管长江三桥依然在运行，坐轮渡往来江南江北的人特别多，那是万州人共同的记忆。长江二桥维护好后，大家一致要求轮渡不能全部停，至少每天往返一班。我每个月总要去乘坐一次轮渡上下班，踏波而来的感觉格外温馨。

假期来临，老同学何大江回到陈家坝，我们在滨江路上漫步。我笑着说，我现在也是陈家坝人啦，我们是一个村的人。

何大江没有回答我。滨江路上有一支合唱队正在唱《我的祖国》，何大江走进队伍——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歌声响起，漫步的人纷纷围过来，加入到合唱中——

我们都在岸上住。

（作者单位：重庆长江人力资源公司）

责任编辑：张莉